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5 年 4 月 30 日第 50 期（增刊）

## 本期目录

### 〔清华文革回忆反思专辑〕

#### 书海泛舟

孙怒涛 《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前言

秦 晖 “否定”并未彻底 “真相”仍待揭示

——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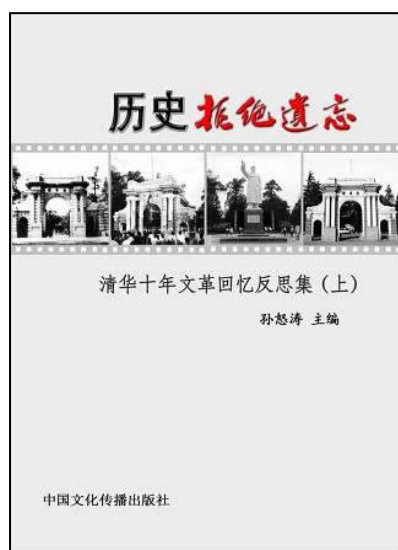
唐少杰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历史引论

孙怒涛主编 《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目录

孙怒涛辑 清华文革书目

## 〔清华文革回忆反思专辑〕说明

本专辑向读者特别推荐孙怒涛主编的《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



忆反思集》一书（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5 年 2 月第一版）。该书集中了众多清华校友、清华文革见证者和研究者的力量，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回忆和反思了清华大学十年文革中的许多情况，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和有价值的思考。

这本书的主编孙怒涛，在 2013 年出版其长篇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时，实际上就已经对编辑这样的文集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他在《良知的拷问》一书中就特设了一个【文革·反思】专题栏目，收进了其他校友的十篇文章。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这一代清华人，都怀有一颗对祖国

对民众赤诚的心，都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都身体力行不让文革那样的时代悲剧重演，都祈望民富国强、政治清明、中华民族有美好的未来。否定文革、批判文

革、反思文革、总结文革是我们的基本共识。如同别人带动了我，我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不同类型的清华文革亲历者与我一起做这件事，于是我向一些好友发出了邀请。承蒙厚爱，他们奉献给广大读者的篇篇都是力作，件件皆是上品。这些特约文稿均收录在【文革·反思】专题里。作者有当年的团派、414派、《八八》派和非团非四的朋友，有头头更有‘小兵’。我还向一位干部、一位《八九》老红卫兵约稿了，可惜未能如愿，但愿以后能有机会搭建一个更大更广的平台让更多的清华人展示所思所想。”

现在，这部《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就是一个“更大更广的平台”。从出版时间上可以看出，孙怒涛是在《良知的拷问》刚出版（或者刚定稿）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这一平台的搭建工作的。

这本书的编者和作者们，为巴金老人倡建的“文革博物馆”献上了一块厚重的砖石。他们的努力，也为其他人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

## 【书海泛舟】

# 《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 前言

孙怒涛

作者简介：孙怒涛，浙江慈溪人，1942年生。1960年入读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现计算机系）。毕业前夕遭遇文革。后留校任教。1980年调浙江省计算技术研究所，至1999年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孙怒涛联系邮箱：[snt100@163.com](mailto:snt100@163.com)（右图：孙怒涛近照）



## 一、历史拒绝遗忘

文革，离我们将近有半个世纪了。

文革历史正在被社会所淡忘。

对于个人，选择“快乐”地遗忘还是痛苦地记忆，那是自己的权利，他人无可非议。但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于生生不息的后代，这是一件必须直面，攸关千秋的大事情。

现在，有些人筑起了一道厚厚的、绵绵的遗忘之“墙”，牢牢地、密密地、有时是选择性地把文革真相“围圈”起来，不许窥视记录；“掩埋”起来，不准追根溯源。

作为国民，我们的回答是明确而坚定的：历史，拒绝遗忘！

因为遗忘，意味着放弃对文革发动者、领导者、加害者的问责；

因为遗忘，意味着引发文革的体制性弊端不再被深究；

因为遗忘，意味着亿万文革受难者的苦白受，血白流，命白丢；

因为遗忘，意味着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本书，是一群清华文革亲历者、研究者的集体记忆和思考，也是我们拒绝遗忘文革历史的高声呐喊！

历史拒绝遗忘，历史不属于遗忘！

拒绝遗忘历史，拒绝遗忘文革历史！

## 二、文集的几个特色

### 1. 作者分属于当年各个不同的阶层或群体

清华十年文革，从1966年6月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以1968年的“七二七事件”为标志，分为清华文革的前期和后期。

前两年的清华文革无疑是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作为那时期运动主力军的学生自然是这段历史的主要回忆者。老团与老四，当然不会缺席。作者中有小兵，也有头头。两位沉寂多年的著名“蒯派”令人惊喜地“浮出水面”。更为难得的是几十年来不现身影的老红卫兵中，也有一位重量级的总部委员参与到回忆反思的行列。当年的教师已近耄耋之年，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依旧清晰。遗憾的是，当年颇为活跃的干部群体，如今提笔回忆者寥寥，显得有点孤单。

清华文革的后八年是由军人主导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时期。表面上狂暴稍敛，暗地里浊流涌动。曾在鲤鱼洲“劳改”农场走“五七”道路的新老教师们，诉说着当年的不幸和苦难。在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显现有工农兵学员顽强抗争的身影！

有意思的是，一位当年才是初中生的清华子弟，记录了一个青涩少年心灵中的文革感受。

本书最年轻的作者是一位目前尚在学校读书的“小清华”。作为九零后的青年，他对文革的思考给我们这些老者以欣慰，为新生代树立了好榜样。

需要说明的是，每一位作者都很难说是当年或现今哪一个阶层或群体的代表。他们叙述的是个体的经历，有的经历比较另类，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但是，这本由六十余位作者完成的集体记忆，足以反映文革年代清华园的政治生态和众生命运。

由于编者能力有限，清华十年文革中还有许多重大的事件没有在文集里得到反映，某些时段尚属空缺：如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梁效”写作组、“罗文李饶专案组”等等。有些小群体，如高干子女、武斗中的枪手、派战中的打手、教职工中的推手，都未能约到稿件。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只能留给以后的有心人来弥补了。

清华文革的回忆和反思，如果仅由几个派头头，几支笔杆子来写，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文革是全民参与的运动，那么对于文革的回忆和反思也应该是全民都应做的功课。鼓动尽可能多的人一起来回忆思考，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文集中，虽然某些回忆只是凡人小事，有些思考可能不够深刻，但它们构筑了文集的厚实基础，并从中涌现了众多的精品佳作。作者们参与文集的本身就是他们拒绝遗忘历史意识的强烈表达。作为亲历者和研究者，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尽了自己应尽的历史责任。

## **2. 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专为文集而原创的**

编撰文集的目的之一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对清华文革历史的回忆和研究。仅把已经发表在各处的文章收集出版，虽然也有意义，也有影响，但作用毕竟有限。

文集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作者专为文集而原创的。一篇篇文章都是我们一顾再顾约来的不易之稿，一篇篇力作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创作成果。这七十余篇新鲜佳作，代表了当今清华文革研究的最新水平，是清华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给读者的悉心奉献。它的集中推出，相信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

## **3. 反思与回忆并重**

依编者之愚见，文革资料可以包括三个大类：

第一类是原始资料，即在文革年代形成的资料。文革资料虽然汗牛充栋，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些资料正在被岁月所淹没。巴金老人提议的文革博物馆，在他去世后那么多年依然毫无动静。这类原始资料是现代文物，只能被发掘，不可能再生。挖掘、收藏、整理、保存原始资料的工作已有人做了一些，有待继续努力。

第二类资料是亲历者的回忆。虽然几十年后的回忆可能会有缺损，会有差错，但依然是十分宝贵的。它留下了当年生动鲜活的时空场景，对原始资料所起的订正、解释、补充、完善作用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第三类资料是亲历者的反思。因为是亲历者，他们的文革经历、心路历程，他们的观点观念变化以及对现今的认知，于后人来说无疑是一份生动而宝贵的资

料。尽管他们的反思可能会带有某些局限性，如时代局限、派性残余、记忆偏差、个人经历有限等等，但依旧宝贵。

随着文革亲历者的老去或离世，如果说第一类资料还能如发掘文物那样继续挖掘的话，第二、第三类资料势必越来越少，直至最后断绝。因此，当前尽可能多地留存这类资料就更显得重要和迫切。

#### 4. 对各种观点兼容并蓄

社会上对文革的态度有多少种，清华校友中对文革的态度也有多少种：既有否定的，也有肯定的；既有彻底否定的，也有全面肯定的。

文集对各种政治观点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文集录用的基本要求是：（1）尊重事实；（2）平和说理；（3）条理清楚。我们没有把“观点正确”或“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作为录用的标准。

清华团、四两派由唇枪舌战到血腥武斗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恶斗的结局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社会问题只能靠和谈、协商、妥协才能取得长效的解决。

我们提倡各种观点在文集这一平台上尽情展示。我们鼓励原属于不同派别的成员从不同视角进行回忆和反思。我们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辩和交锋，理解偶尔流露的一些派别情绪，但不提倡点名批评（公众人物除外），不使用“五毛”、“汉奸”等贬称，禁绝人身攻击，力戒派性残余。目的就是要保持文集平和说理的氛围，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在对观点的评判、辨析上。

我们组织了两篇这样的文章：一篇是多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回忆，另一篇是多人对同一资料的不同解读。文集里还有一些文章曾在校友网上为征求意见发表过，我们选用了各种不同观点的跟贴附在其后。这类文章不仅形式新颖，同时彰显了包容精神。

实践民主始于足下。我们把贯彻兼容并蓄、倡导包容精神作为践行民主的第一步。当然，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还有不少遗憾。譬如，在我们校友中有一些持有肯定文革观点的，虽然我们坚定地否定文革，我们仍然非常想收录几篇肯定文革的文章。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如愿。

本书主编和顾问郑重声明：我们录用某篇文章，并不表示我们赞同文章的观点，认可作者的立场。事实上在评审稿件的时候，大多数录用的文章都有一部分顾问持否定的态度。文集录用的所有实名文章（包括序言、导论、前言、后记等），一律文责自负。文责自负的含义是：作者对文章负责，文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 5. 广义清华文革的概念

清华文革，一般是指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发生的文革。这是狭义的清华文革。

清华文革对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外界对清华文革也给予高度的关注，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因此，文集所涉及的清华文革也就具有了广义的概念。

凡是清华人的文革经历和对文革的评述反思以及非清华人在清华文革中的经历和对清华文革的研究评论，都属于文集收录的范围。这里说的清华人，既指文革期间在清华的学生、教师、干部、职工，也包括文革前后毕业离校、在国内或海外的清华校友，甚至包括正在清华求学的在校学生。此外，一些不同身份的非清华人在清华文革中的经历，为文集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他们对清华文革的研究与评论，展示了崭新的角度、宽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

在文革中，既有非清华人对清华文革的领导，也有清华人在外地对当地文革的干预；既有非清华人深陷于清华文革的泥潭，也有毕业离校的清华人在外地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这些内容在文集中都有所反映。

### 三、板块介绍

#### 【岁月印迹】

清华十年文革中，重大事件几乎年年都有发生，有好些事件的影响是全国性的。

这一板块的作者全是所述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有些兼及所想、所思。

无论记录的是大事件还是小片段，无论其收录价值是高还是低，只要是真实的，都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生态，再现了难忘的历史场景。

这一板块的作品大体上按事件发生的时序编排。有些时间跨度较大的文章，在编排上则比较随意。下面这几个板块，以作者姓名的拼音排序。

#### 【人物春秋】

文革，几乎影响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

在这个板块中介绍了几位文革人物。当年他们可能是上层的大人物，也可能是基层的小百姓。从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可以看到，文革是怎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着个人的命运。

#### 【亡灵祭坛】

据统计，清华文革期间共有 58 位死难者，其中包括在 1968 年 7 月 27 日“工宣队”进校制止武斗时遇难的 5 位工人师傅，但不包括毕业离校后在外地死难的清华校友。

文革死难者是最不幸的群体。我们要记住他们，不能让他们只留下一个名字，更不能只是一个数字。我们应该让后人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学习、

生活、为人、家庭，以及同学朋友对他的印象，还有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最后因为什么原因、受过怎样的折磨，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了。正是这些确凿的、血淋淋的例证，让后人相信并记住文革确实在神州大地，在高等学府，在我们这代清华学子身边发生过、横行过、肆虐过、祸害过。

文革，是清华百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不堪回首的一页。我们坚信，无论还要等待几年，或者几十年，在清华园里必定会建立一座文革死难者的纪念碑。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率先在我们的心里竖起这座无形而永存的墓碑！

因武斗伤残而早逝的以及毕业离校死于外地文革的清华校友，同样都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

文革亡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人亡友，特设此板块以表达我们的沉痛祭奠。

### **【校园内外】**

这一板块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是每一篇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这里既有非清华人参与了清华文革，也有清华人介入了外地文革。其参与的程度之深，介入的影响之大，是在其他单位里很难见到的。

### **【思辨研讨】**

这是文集的一个重点板块。

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教育的、人性的视角，对文革进行了认真而深刻的思考。

除个别作者以外，绝大多数作者都是文革的亲历者。亲历者思考文革，虽然不免会有一些局限性，但由于他们曾亲身感受过文革岁月的狂躁氛围，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有些人目前生活在海外，前后对照，中西对比，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视野是未曾亲历过文革的研究者所不能企及的。

尤其是，他们现已年近古稀，敢想敢言。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再也不会有这些亲历者的思考了。因此，他们的思考尤为珍贵！

可以看到，各人思考的结果不太一样，有的观点甚至相当对立。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可贵在于，他们都是在平和地说理论道、评史观今。

对与文革密切相关的后文革时期的研讨与批判，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有一篇文章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中收集了几位非清华学者对清华文革的深度研究和精辟论述，在此深表感谢！

### **【资料拾零】**

收集整理清华文革资料并非是集成的主要任务。但在集稿过程中碰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文革资料，不忍遗弃，本着“能拾一点是一点，将来总会有用的”想法，故而有了这个板块。

读者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原来捡拾在这里的不全是“贝壳”，还有“珍珠”。

#### 四、封面上的二校门

与清华有缘之人，都会对二校门情有独钟。

二校门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它见证了清华的百年历史，包括十年文革历史。它本身的历史就是清华百年、文革十年历史的浓缩。

为让后人记住这段难以忘却的岁月，我们将二校门选为文集封面的主图案，并以相机胶片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二校门的历史：

左起第一张照片是解放前的二校门。那时，周边还有围墙。围墙虽存，不挡“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扩延，成为养育清华学子心灵成长的信条。后来，围墙拆除，校园扩展。传统的清华精神却在慢慢销蚀，清华变成了一所培养听话出活工程师的加工场。

第二张是文革期间，1966年8月24日下午，12所学校的老红卫兵开进清华，推倒二校门。有人在升降机上用大锤砸向“清华园”。这是野蛮对文明的宣战，是党化教育酿成的残暴恶果。其实二校门早就在缓缓地“倾倒”，它此时徒具华丽的外表，实体已被“蛀”得千疮百孔。

庄重典雅的二校门倒塌不久，文革发动者的塑像原地竖起。这第三张照片是那样的突兀、不协调，凸显了文革时期的荒诞与反常。

文革结束，塑像移走。第四张是重建后的二校门。它风采依旧，受人景仰，但本质上只是一个仿制品。何日能接续传统，唤起生气？且待“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大学灵魂慢慢苏醒！

---

#### 【书海泛舟】

### “否定”并未彻底 “真相”仍待揭示

#### ——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

秦 晖

按：本篇是作者为孙怒涛主编《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所作的序。

作者简介：秦晖，生于1953年。1966-1969年一直当初中“新生”，1969-1978年上山下乡在“早稻田大学”，1978年成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有《传统十论》、《共同的底线》、《田园诗与狂想曲》、《问题与



主义》等著作。（下图：秦晖近照。）



## 我们都是“六六届”

文革当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但是在表象上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一些研究者眼中，“学生运动”与学生身份的“红卫兵”都是文革的典型景观。而在曾经构成这一景观的人群中，孙怒涛先生他们这些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最年长的老大哥，我们这些文革爆发时刚进中学的“六六级（六九届）初中生”则是最年少的小弟。

与“六六届”中学毕业生（后来所谓狭义“老三届”中最高一届，就入学而言一般是初六〇级）当时几无例外地都滞留学校经历文革不同，该届的大学、小学毕业生与文革的联系差异很大。六六届大学毕业生该年大部分都没有按时分配工作而留校参加了文革，但也有少数离校参加工作进入了社会，不再卷入“学生运动”。至于小学，在1966年暑期这个通常年份“小升初”的时段，全国的学校都已停课，教学业务完全瘫痪，但是“升学”的手续则各地进展不一。有些省份1966年小学毕业生当时就没有进中学，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才进入初中；但另一些省份如我所在的广西，则还是按常规分配我们进了中学。

就上学而言，进了已经停课的中学和没进无甚区别，就“革命”而言就不同了。文革时小学虽然也有取代少先队的“红小兵”，但基本是小孩奉命做戏。中学则不同，它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是“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加之无课可上，“革命”就成了我们这些人当时在中学唯一的“正经事”。此后在1967年全国中学基本都没招生，等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恢复招生时，自主的“红卫兵运动”实际已经结束，原来的红卫兵，有的得意的离校工作、甚至当官成了新的“当权派”，大部分失意的则被发配边疆农村，甚至被整被杀。虽然直到1970年共青团组织恢复前一些中学仍然有“红卫兵”存在，但那已经是类似此前共青团的官方“助手”，而不再是“革命群众组织”，更不会是“造反派”了。所以在我们之后进中学的学弟们基本没有参加红卫兵运动。而我们这届学生（尽管是“一进校就停课，毕业时刚停火”、没上过几天课的所谓学生）成为参加过红卫兵的最低一届。虽然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前不久还被称为“新生”（因为当时我们不仅几乎没有进过课堂，而且红卫兵时代也没有比我们更“新”的一届学生了）的少年基本只是跟着高年级学长们当拉拉队，在红卫兵中并不是叱咤风

云的角色，但比纯粹的看客还是不同。所以对孙怒涛先生他们写的文章，我是深有“在场感”的。

几十年后我在清华大学当了历史学教授，虽然主修的并非当代史，但是也写过一些有关文革的东西。而这时我忽然发现我当年在广西的经历还与清华文革有“交集”。

这起缘于导致清华造反派灰飞烟灭、同时也是全国文革史上重要转折点的那个“七二七”事件：1968年7月27日几万名工人、解放军（后来得知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清华，当时正在“武斗”的清华“井冈山”与“四一四”两大派都不知怎么回事，在校内处于优势的“井冈山”派头头蒯大富多方与北京及中央文革当局联系了解缘由，但所有电话都不通。在再三联系无果后，蒯认为自己已被封锁，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镇压”，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遂下令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校园被占领后，蒯大富等人狼狈逃出，毛泽东遂于次日“召见”包括蒯在内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见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后放声哭诉“黑手”的行为，不料毛声称“黑手”就是自己，并严厉训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内的“五大领袖”从这天起全部从失势走向垮台，清华、北大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造反派也从此土崩瓦解。毛泽东派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后简称“工宣队”）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文革秩序”。

### “七二四”接见与“七二七”行动：从广西看清华

几十年过去，蒯大富先生对这段戏剧性变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忆文字和口述中多次说，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与当时的很多中央领导保持有可靠联系渠道，而且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与时任北京市革委负责人的谢富治等首都主管也有频繁的工作联系，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

<sup>1</sup>就连当时属于与蒯大富敌对的“四一四”派孙怒涛等人，对此也有同感，他们与蒯再对立，也不会相信蒯有胆量对毛公然抗命。<sup>2</sup>由于毛泽东在“七二八召见”时一方面严厉训斥，一方面在蒯大富哭诉时毛也激动流泪，还明确声称在清华两派中他反对四一四而偏爱团派，并当面交代在场各领导人不要整蒯，所以蒯大富至今相信毛直到最后还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只是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沟通有误，导致“历史因此改写”。

但我听到这里，就想起了对我当时曾经参加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来说很难忘怀的一幕。那就是“七二七”几天前的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长最后一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当时，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为起点，对“广西四二二”的大规模剿灭已经在南宁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这次接见其实是正式宣布对“广西四二二”组织的死刑判决。“接见”后不久，四二二的代表们便被全数扣押入狱。而我们这些没资格到北京去的普通四二二成员后来读到广西当局广为散发的接见纪要时，无不感到五雷轰顶。记得一个同学当即念出一句安徒生作品中的话：“啊，我亲爱的康斯坦丁，一切都完了，完了！”

就在这次历时数小时的“接见”中，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内的阵容庞大的中央首长们异口同声，一面倒地严厉斥责广西四二二。除了谈广西的事外，斥责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在场的四二二人员追查所谓的“清华-北航黑会”的情况，尤其是点名追查蒯大富。这些处理国家大事的首长们一个个仿佛成了“专案组”的审讯人员，不仅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而且追问之具体、口气之武断令人惊讶。周恩来首先指责四二二人员“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康生点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在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陈伯达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周、康和陈三人都轮番追问“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吴法宪说：“你们‘汇报团’（按：当时各派来京人员正式名义都叫某某组织赴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周恩来最后要求四二二人员回去写交代，“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按：四二二代表远没有这么多，“六百多人”似指各省来京及北京高校造反派人员被认定参与“黑会”者的总数）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

---

<sup>1</sup> 2013年6月23日访谈蒯大富，深圳。关于这个话题他也有过多次文字表述。

<sup>2</sup>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627页。

出来。”<sup>1</sup>

这份接见记录表明几点：①“中央首长”们认定广西的问题并不孤立，各省及北京的造反派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黑司令部”，而“清华-北航黑会”就是一个重大标志。②清华（当然是指“清华井冈山”）与蒯大富被置于这个“黑会”的重要位置。而且从反复点名追查清华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陈伯达提出韩爱晶和蒯都要“去劳动”外，当场再没有人提到韩，除并列指责“清华、北航”以外也没人单独提到北航，却几次单点了清华）的语气看，中央首长们已经完全把其看做整肃对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广西人那里，陈伯达还明确说要把蒯清洗出政治舞台。③与会的“中央首长”很多，而且来自我们现在知道其间矛盾很大的各个派系，如中央文革文人集团和林彪军人集团，以及超越诸集团之上的（也有人认为是自有一集团的）周恩来等，但他们这时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显然，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能够整合出这样的一致。

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工宣队”进占清华之举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谁还会觉得蒯大富那天到处打电话都碰壁只是阴差阳错的沟通问题？

### 关于“清华、北航黑会”

那么，这四二二人员参与了的“清华-北航黑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七二四”接见与“七二七”仅隔两天，但接见记录公布、让我这样的世人读到则已经是在“七二七”事后。接见中周恩来说：今天讲的内容“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意指传给蒯大富这类“黑会”中人），我也不怕你传出去。”这显然是讲反话，接见后不久即失去自由的朱仁及其他广西人大概不可能给蒯大富们通风报信（且不说他们根本还不认识）<sup>2</sup>。我们现在知道“清华井冈山”是非常重视搞情报（所谓“动态”）的，但这两天他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风闻了也未重视。直到现在，清华文革中人写回忆录虽未汗牛充栋也已经卷帙颇为浩繁了，“七二七”也是这些回忆录经常提到的，却未见到有谁提及这件对清华井冈山似乎是相当致命的事。后来我曾当面问过蒯大富等一些井冈山要人是否记得有这么个会议，居然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sup>3</sup>尽管其实毛泽东在“七二八”训斥蒯时就

---

<sup>1</sup>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注明的整理时间为1968年7月26日，28日起该文件在广西以传单、号外等形式大量散发。本文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按：1967-68年间中央首长每次接见广西两派的记录都有两派和广西官方（军方）各自整理的两三个文本，但最后一次接见时“四二二”事实上已经失败，所以只有这一个文本。

<sup>2</sup> 2014年8月10日访谈中笔者就此问过朱仁本人。

<sup>3</sup> 就我所见，似乎只有当时北航红旗的戴维堤在其自传《逝者如斯》中介绍了此会的始末。但是他与武传斌一样也称之为“北航黑会”，不认为有清华的什么事，其实清华受此会的影响应该比北航更甚。

指责他和韩爱晶串联各省造反派，“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林彪接话：“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但是，事后无论蒯还是清华井冈山其他人谈起“七二八”召见，谈起他们垮台的缘由，大都还是讲搞了“百日武斗”、武力对抗工宣队等惹怒了领袖，几乎没人提到这个“黑会”。不但如此，后来从毛泽东时代蒯大富被捕坐牢直到邓小平时代正式判刑，列举的罪状中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为什么？我想原因其实也简单：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蒯大富他们没当回事，一直就没往心里去。而“中央首长”们其实当时对事情的整个经过也已经查的一清二楚。首先，“七二八”召见时韩爱晶就已解释：

“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学院东方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sup>1</sup>

其实不用韩爱晶解释，“七二四”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情况已经很清楚，他当时就说：“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呆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尽管这个说法也不确切（见下文），但无论蒯大富还是韩爱晶，清华（井冈山）还是北航（红旗）都不是会议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

武传斌先生当时是广东“旗派”头头、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是我在北京参与串联，组织，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个省、市在京上访的造反派大会”，即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时所说的“北航黑会”，“之所以拉上清华，那是因为在大会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请来上了主席台。但我从未听过‘清华、北航黑会’的说法”；“回广州后，在广东省革委会全会上批判我时，省的主要领导传达中央领导讲话时，定性为‘北航黑会’。‘清华-北航黑会’如有存在，也可能另有所指。”后来他又略作更正说：“68年7月16日第一天的会议是在清华开的，老蒯参加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仅对各地

---

<sup>1</sup> 7·28 召见记录，见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造反派来北京，来清华表示了欢迎和支持，没有更多的讲话。7月17日的会是在北航开的。”<sup>1</sup>而根据“七二四”接见时四二二参会代表白鉴平所说，会议是18、19日开的，与武传斌40多年后的回忆有两天之差，应以白鉴平当时的说法为准。另一代表高寿仪说：“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sup>2</sup>这也与武传斌的说法一致。

至于周恩来指为与武传斌一起成为“黑会主席”的朱仁，是“七二四”接见中被多位“中央首长”连珠炮式审问追逼得最紧的一位。据接见记录，当时他在追问下“转弯抹角、吞吞吐吐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sup>3</sup>但是，近年笔者采访他时，朱仁否认了“主持”之说，只是说自己发言介绍了广西的情况，并且说他参加的会议只有一天，是在北航开的，没有在清华开过，如果清华也开了，那自己并没有参加。<sup>4</sup>

这个说法与当时作为柳州四二二代表的钱文俊所说可以互相印证。钱文俊近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会议似乎是开了两天，但第一天通知他们到清华，却因为当时清华武斗，校园一片混乱，根本找不到会场，实际没有开成会，会是第二天在北航开的。有个清华的到场（钱说他不认识蒯大富，不能确定是不是他）讲了不少的话，主要就是泼冷水。辽宁八三一的人提议各省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他大惊失色，表示这绝对做不得。也有人说，全国性组织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个各地造反派互通消息的联络站怎么样？清华的人说那也不行，他们不能参与这样的事。弄得大家很丧气。最后也就是大家发发牢骚，觉得各省造反派都危机四伏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了。<sup>5</sup>

钱文俊说的这个清华人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蒯大富。40多年后笔者采访蒯大富时，他对这个会已经没什么印象，但后来想起说是有这么一个会，他当时就害怕跟各省这些人混在一起，但碍于武传斌他们的面子到北航去了一会儿。“有人提出成立各地造反派联合组织，我跟中央文革和周总理这些首长打过那么多交道，当然知道这是大忌，要惹大祸的，就断然否定了这个馊主意。有人又说那就办个联络站保持联系，我说即便搞联络站也要先请示中央文革，得到中央的明确同意才能搞，否则是绝不能搞的。说完我就离开了。”<sup>6</sup>

---

<sup>1</sup> 武传斌电邮。

<sup>2</sup>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1968年7月26日整理，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sup>3</sup>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1968年7月26日整理，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sup>4</sup> 2014年8月10日访谈朱仁，南宁。另据朱仁接受旅美学者谭家洛访谈时说，他在会上并没有听到辽宁八三一提议建立全国造反派组织。这番惹祸言论大概是在他未参加的会上说的。此条承谭家洛先生告知，谨此致谢。

<sup>5</sup> 2013年7月8日电话访谈钱文俊

<sup>6</sup> 2013年6月23日访谈蒯大富，深圳。按：清华四一四方面的消息说蒯大富的发言则相当火辣：“①除

40 多年后各人的回忆有些细节出入完全可以理解，但综合这些回忆和 1968 年当时披露的情况，基本事实大致已很清楚：1968 年盛夏时，各省造反派都已面临严重危机（曾短暂得势的大都已经失势，从未得势的则面临更严厉的镇压），他们纷纷组团赴京“上访”。广东的武传斌就出头让这些难兄难弟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搞了个聚会。

### 所谓“黑会两主席”

为什么是武传斌？因为他领导的广东旗派这时也处在转折点上。旗派在 1967 年 3 月曾与偏向“老保”的广州军区有过冲突，但毛泽东发出击退保守的“二月逆流”的旨意后，周恩来承旨专门飞到广东，于 4 月 18 日在广州钦封旗派是革命造反派，其对手则是“保守”的，并要求广州军区支持旗派。我们知道，这一年北京曾多次隔空表态、乃至派出“首长”（如到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等）前去直接支持各地造反派，使之从逆境中咸鱼翻身，但由周恩来亲自去现场钦点造反派的还只有广东。旗派因此声名大噪。人们现在知道广州军区及其司令员黄永胜对旗派心里是反感的，<sup>1</sup>但也不得不予以支持。1968 年 2 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黄永胜是主任，武传斌是常委，两人关系一如北京的谢富治与蒯大富。

1968 年 3 月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到北京官升总参谋长，旗派却与此后的广州军方及广东省革委主流关系恶化，这其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由盛转衰是同一趋势。但与其他一些省份的造反派（如广西四二二）相比，旗派当时面对的形势尚不那么险恶，武传斌也并不甘心。他认为广东军方变脸是黄永胜离开の結果，而黄永胜还是支持自己的。于是便与另一位省革委会旗派常委邱学科一起到北京找黄永胜告状。到北京没能见到黄永胜（黄其实正要整他呢），却发现各省落难造反派纷纷来京上访，自我感觉尚不那么坏的武传斌便出头联络这些“造反派战友”开了那个会，无非是想分析一下形势，并没打算成立什么全国性组织（会上辽宁与会者提出的这个建议并非原先所料）。远在南国的武传斌毕竟不如北京人那么敏感，不知道这是犯了大忌。但他在北京开会总要有东道主，找的自然就是北京的“造反派战友”韩爱晶蒯大富们。韩、蒯尽管当时还风头十足，但经过两年的“政治经验”已经不是 1966 年时的“初生牛犊”，他们是知道禁忌的。韩同意接待武传斌，是因为武与他一样是省级革委会常委，而且据说还有黄永胜支持，属于他所说的“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不

---

河南、青海外，全国现在是保守派掌权；② 现在不是中央支持造反派的问题，而是反之；③ 全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内战。”（见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1968 年 7 月 23 日条，此信息为孙怒涛先生提供，谨致谢。）但多名与会者都没有这个印象。

<sup>1</sup> 叶曙明：《迟泽厚访谈录》

是朱仁那样的在野人士。尽管这样，韩仍然没有参加武传斌主持的会，只是提供了会场，出席会议的北航红旗成员侯玉山和祝春生据说还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外省人的过激言论。而这个情况康生也知道。<sup>1</sup>

就广西四二二而言，参加这个会议也是稀稀拉拉的，在京四二二成员有的只去了北航，有的只去了清华，笔者所知的与会者中，两校都去了的似乎只有白鉴平。更有趣的是，被康生诬为“黑手”、周恩来指为“黑会主席”的朱仁并不是四二二赴京汇报团的正式成员，而是汇报团已经在京多日后，由于南宁事态危急，他自己决定上京“报告情况”，甚至连车票也是自己买的。<sup>2</sup>在四二二及其赴京人员中朱仁并不在领导层，康生之所以盯住他，只因为他是广西自治区党校教师，被认为有理论水平。而四二二“柳铁工机联”一位中学红卫兵此前写有一篇观点激进的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当时与湖南杨曦光（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清华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等都是中央点名的异端“大毒草”。康生仅以“中学生不可能看过《哥达纲领》”为理由，就一口咬定中学生写不出这篇文章，肯定有“黑手”代笔，而党校教师朱仁就是代笔者，也就是四二二中的“黑手”。其实，不要说中学生完全可能看过马克思已全文引述过的《哥达纲领》<sup>3</sup>，就是没看过，当时的学生不少也从我国“共运史”宣传中知道“哥达纲领”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无原则合并”的结果，那篇文章不过是借此典故来表达其不愿与对立派“老保”合流之意，与《哥达纲领》文本的内容毫无关系，何以非得看过那文本才写得出来？更何况在南宁工作的朱仁根本不认识在柳州的作者。

正如北航的戴维堤后来所说：“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不是黑会，正像‘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

---

<sup>1</sup> 戴维堤：《逝者如斯》之 73《北航黑会》，乌有之乡网站

<sup>2</sup> 2014 年 8 月 10 日访谈朱仁，南宁

<sup>3</sup> 接见中有人说看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康生驳斥道：“我说的是《哥达纲领》”。但《哥达纲领》全文本身只有短短四节，马克思认为它“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因此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逐条逐句”地引述该纲领并予以了驳斥。这些引文其实就是《哥达纲领》的全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19 卷，第 8、11-35 页）因此根本不存在看过《哥达纲领批判》却没有看过《哥达纲领》的问题。康生这样驳斥其实恰恰表明他这个“马列主义权威”其实倒真可能没有看过马克思的这本“经典著作”。



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大决策。”<sup>1</sup>

北航如此，清华就更不用说。尽管“黑会”是武传斌张罗的，北航韩爱晶只是勉强接待了他，清华连接待方也不是，主要的会议也是在北航开的。有的回忆说蒯大富在会上露了个面但没怎么说话，有的回忆说他讲的话是泼冷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清华与这个会的关系比北航更淡薄。武传斌与戴维堤都说他们听到的指责是“北航黑会”而没有清华的什么事。但实际上，从“七二四”接见时周恩来指责“清华、北航的黑申联会”，吴法宪说四二二是“向清华、北航汇报”，其他中央首长也反复追问清华有谁与会、蒯大富讲了什么，直到“七二八”召见时毛泽东指责的“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显然当局追究清华和蒯大富要甚于北航和韩爱晶。

另一方面，广西四二二只是受武传斌之邀与会的众多各省组织中普通的一个，既非会议的发起者，也非接待者，更不像辽宁八三一那样在会有特别敏感的发言。当时七三布告已经发布，广西屠杀正酷，北京的四二二人员尽管极感冤屈无诉，但恐惧远超于愤怒，已是待罪羔羊心态，哪里还敢挑头当什么“主席”？后来武传斌、戴维堤的回忆对四二二人员会上的表现也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当局却把四二二拔高到突出的位置，周恩来说四二二的人是“黑会”两主席之一，毛泽东列举的与会者头一个就是广西四二二。作为当时全国被镇压得最惨的造反派，四二二那时被“枪打出头鸟”，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就是针对广西颁布的，是全国第一个公开出动正规军队剿灭造反派的布告（以后才有针对陕西的“七二四”布告、针对山西的“七二三”布告等）。而“七二七”工宣队占领<sup>2</sup>清华，就是打着宣传“七三布告”的旗号。

### “七二七”行动保密之谜

就在占领清华次日的“七二八”召见中，出现了这样充满杀气地把广西和北京相联系的话语：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

---

<sup>1</sup> 戴维堤：《逝者如斯》之 73《北航黑会》，乌有之乡网站

<sup>2</sup> 现在一般说是“进入”清华，其实当时工宣队虽然没带枪更没动枪，但却是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性强制行动，三万多人包围一千左右的在校学生，不仅“强行缴械”、拆毁武斗工事，做了“制止武斗”所必需做的事，而且查抄了学生组织的办公室（当时谓之“抄家”），抓了不少人。事后他们即成为清华的主人。所以，这是一次典型的强制占领行动，尽管占领者没带枪，但甚至不能说是“和平解放”。因为和平解放也是有协议的。而团派即便不抵抗也未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他们也是被强制撵走的，已经不是“傅作义”了。

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彪：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爱晶：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泽东：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来：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泽东：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sup>1</sup>

这是迟到的蒯大富赶来之前诸位首长对北航韩爱晶的训斥。这些话的核心就是“造反”如今已经被禁止，“谁如果还继续造反”就要被镇压，“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广西四二二已经被描述成杀人放火的“土匪”、“国民党”、“歼灭”的对象（真相详见后述），而以清华、北航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几乎被当作四二二的后台，他们不仅窝藏“土匪”（“广西佬躲在你北航”），还“想控制全国运动”，加之林彪说的惊人之语：“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这明显与陈伯达所说的全国造反派开会成立“黑司令部”同义。

当时蒯大富人尚未到，谈话就涉及了蒯大富“骑虎难下”的问题。毛泽东宣称：“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在当时语境下，韩爱晶说蒯大富骑虎难下，有为蒯开脱之意，即蒯大富受制于人，身不由己。但蒯大富骑的什么虎？受谁的牵制？无非有上下两个可能。“上”当然不是后来讲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当时他们都与毛泽东一起喝斥韩、蒯等，而且言辞比毛还厉害），只能是说蒯“奉旨造反”惯了，一下子难以适应完全相反的、镇压造反的新圣旨。若如此，这个“虎”就是发布圣旨的毛泽东了，毛泽东自己还能“把老虎打死”吗？另一可能是指“下”，是说蒯大富想转向，他手下的群众不干，那老虎就是指他们。而毛

---

<sup>1</sup> 7·28 召见记录，见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泽东怒称要“打死”他们以便让蒯下来，显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可见，毛泽东如果说对“坏头头”蒯大富尚有一丝怜意，对“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已杀气腾腾了。

另一方面，召见时大家已经知道占领清华时工宣队死伤惨重（以北京“武斗”的标准而言），但毛泽东对此却毫无所动。正如孙怒涛所说：“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 731 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要是他们（死伤者）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对蒯大富与对工人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sup>1</sup>其实，更过分的是这次召见中，国家最高三人的下面这段对话：

毛泽东：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这岂止是没有“表示悲痛和哀悼”而已，“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自得之情是溢于言表啊。

在对蒯派群众和工宣队员双方都表现得很冷酷的同时，毛泽东唯独对蒯大富本人表现出很温情。虽然“召见”的主调是训斥，但与其他首长一味声色俱厉不同，毛泽东（一定程度上还有江青）训斥之余不但为蒯大富流了泪，还当面痛贬蒯的政敌“四一四”，表示两派联合仍要以蒯为主，还叮嘱臣下不要整蒯大富。尽管这一切后来都没兑现，但很多人尤其是蒯大富自己仍然觉得这是“挥泪斩马谡”，毛泽东对自己一手扶植的造反明星还是有感情的。

的确，人非草木，不能说毛泽东在拿原先的心腹“小将”祭旗时没有一点怜惜。然而这和“挥泪斩马谡”还是大有区别的。且不说当年孔明“斩马谡”时，他那政治家的“挥泪”也有浓厚的做秀意味，但“失街亭”毕竟不是孔明的安排。而“七二七”采取这种派出数万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搞掉一个“黑司令部”的做法，蒯大富们会有什么反应，伟大领袖难道真的没有意料到吗？受命闯入的数万军人和工人徒手面对惊恐之极且拥有武装的蒯大富们会遭遇什么，挥泪的领袖也没有

---

<sup>1</sup>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年，635 页。

想过？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命令徒手的人海对有枪的被围困者“强行缴械”还要“抄家”，能不出“意外”？如果对蒯不打招呼是偶然，何以聂韩谭王等其他造反派也一概被蒙在鼓里？领袖挥泪训斥之余煞有介事地当面告诉臣僚不要整蒯大富，何以他不久还是身陷囹圄？如果是工宣队员的“意外”牺牲“改写”了蒯大富和“井冈山”的历史，那么没有抵抗工宣队的其他四大造反派头头为何也遭到同样命运？

近年披露的一些内情更令人吃惊。如当年海军清华军宣队的朱勇说：“七二七”当天清华的事他们也是一无所知，次日即“七二八”才听说，并到清华参加了8341部队主导的占领。而这个海军军宣队本是早在2月13日就奉命进清华宣传制止派斗的，在校两个多月与两派都混得较熟。但4月23日“百日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却于25日奉命撤出清华，撤出后并未解散，而是集中驻于宣武区待命，并一直与校内两派人员有联系，明显是准备再入清华的。可是，“七二七”当天的行动却对他们保密。把这些先前已经进校做过不少工作、熟悉情况、清华两派也都认识的人撂在一边，却另派三万陌生人闯关而入。这样决策究竟是为了什么？无怪乎采访者李仕林惊呼：“啊……，简直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情况。45年后，我才知道，太难以置信了。”<sup>1</sup>其实另有资料显示，“七二七”那天还是叫了几个海军军宣队的人“带路”，而且前一日还派其中一人（凭过去的关系）到清华团派总部取来清华校园地图以布置行动。<sup>2</sup>但诡异的是这几人对包括朱勇在内的其他绝大多数军宣队同事守口如瓶，而取图者对给他地图的清华人也不吐一字。

聂元梓后来说：“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不就不告诉我们呢？”<sup>3</sup>蒯大富和当时与他对立的孙怒涛也都认为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会发生惨案。但有趣的是他们都不认为这事是毛泽东的故意。蒯大富相信毛泽东的善意，孙怒涛如今其实是不信的。但他认为，毛对是否通知蒯大富的问题是疏忽了，他既不是存心通知也不是存心隐瞒，只是没过问这样的“细节”而已。但他又找材料证明毛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不仅决定发动、而且实际指挥了整个行动，甚至还“蹲在地上指点地图”，“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清华，现场哪些人指挥”都是由毛决定的。<sup>4</sup>与这些具体的细节相比，是否对行动对象保密实际上关系到敌我判断，这难道还是“细节”吗？事实上毛泽东完全明白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召见”时搪塞说：“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这叫什么话？招呼打了就是打了，没打就是没打，

<sup>1</sup> 李仕林：《朱勇访谈录》，见本书。

<sup>2</sup> 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41页

<sup>3</sup> 转引自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47页。

<sup>4</sup>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628-629页。

什么叫“间接打招呼”？谁都知道那时要打的不是什么毛主席希望停止武斗实现联合这种关于领袖“伟大战略部署”的招呼，而就是关于 27 日三万人进清华出于毛主席指令，要求清华配合这种“战术部署”的招呼。这样的招呼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有过吗？显然没有。但毛这样说，也表明他知道不好解释。没有这样的招呼，发生“误会”几乎不可避免。濒临绝境的四一四固然不会抵制绝处逢生的机会，校园本来就一统天下无人挑战、也早就厌恶武斗的韩爱晶或许也不会反应过敏，但这种逻辑能适用于当时的团派吗？

而我们从“七二四”接见可以看出，起码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林彪麾下那几大军头都已把蒯大富看成了敌人。毛泽东如无同感，难道他们能联合起来对毛设局？朱勇等人提供的信息也显示那时对“七二七”行动的保密何等严格。其实，对那些被指为先于中共召开了反对派“九大”、窝藏各地“土匪”、甚至要联络各地“土匪”组织“黑司令部”以“控制全国的运动”的“造反”者，这样应对难道值得奇怪？当然，正如韦国清未必真信他手下编造的“反共救国团”领导“广西四二二”之说一样，毛泽东与中央首长们也未必真信关于清华造反派的上述离奇说法。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英明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如今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他们不犯行吗？至于毛召见时对蒯大富的怜惜和挥泪，不能说完全没有一丝真情，但政治纸牌屋中毛唱白脸别人唱红脸的游戏我们见得还少吗？就在这场召见中毛不是还大讲刘少奇的病情、显示他亲自过问“救活”刘少奇吗？承蒙领袖如此关心的刘少奇此后还活了几夭？他是在怎样的境遇中死去的？

### 广西“处遗”披露的事实： 为什么“制止武斗”后杀人更多？

无论如何，经过“七二四”接见和七二八“召见”，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广西文革和清华文革搭上了关系。但是广西造反派与清华造反派的遭遇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

前面提到“七二八”召见时毛泽东等人大骂广西四二二杀人放火。这件事到了改革时期的 1980 年代已经有了官方的平反结论：“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sup>1</sup>炮击起火。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广西联指却宣传广播说是‘广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街道民房”。<sup>2</sup>当年“七二八”召见时林彪就此事骂四二二是国民党：“我长征进广

<sup>1</sup> 即“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文革前期和文革中期广西当权派韦国清支持的所谓“老保”组织，“四二二”的对立派，当时始终处于强势地位。

<sup>2</sup>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8 年）第 18 册，287

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长征时的情形且不论，可笑的是现在事实证明：1968年在广西“用此计”的恰恰是林彪支持的共产党官员韦国清及其御林军。

而工宣队进清华宣传的“七三布告”，也已经在广西被否定。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发出《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并于5月2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该文件称：“当时中央发布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文件提出，即使为了安定团结在公开场合回避提七三布告，也“应当把七三布告的问题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并开展平反纠错和追究特别严重的大屠杀责任的工作。<sup>1</sup>事实上经中央指示后广西不久就不再“回避”，而是公开了这些“问题”，按官方的说法：“从此，压在人们头上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七三布告’才得撤销，‘文革’中八万四千多冤魂才能得以平反昭雪”。<sup>2</sup>

即便据1980年代“处遗”<sup>3</sup>时官方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中最小的一个数字<sup>4</sup>，文革中广西也有84293人死于非命，其中“七三布告”后的镇压就死了49272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的58.3%。如以革委会成立为分界，则革委会成立前（即包括广西四二二这类造反派能够“作乱”的整个时期）死亡12457人，占14.7%；而革委会成立后（即剿灭造反派的过程中和造反派被消灭后）死亡71816人，占比高达85.3%。<sup>5</sup>另一个对比更为惊人：在这八万四千多死难者中，两派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而其余96%的死亡即80981人都是战后屠杀“俘

---

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sup>1</sup>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1册，3-5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sup>2</sup>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7册，129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sup>3</sup> 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简称，在广西当时这是个家喻户晓的语词。

<sup>4</sup> 所谓最小数字，指逐个核实后有名有姓有死亡情形可查、处遗中分别落实了政策的、精确到个位的数字，除了后列的这组数字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1册“前言”说是“八万五千多人”。宋永毅先生曾根据这套资料中的各县死亡资料自行汇总统计，“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开放》2013年10月号，75-78页）。参加处遗的中央工作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八点九七万人”，“另外，全区失踪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而前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在他写给中央组织部的处遗申诉书中说是“20多万”（袁家藏文献），这应该是民间流传的说法。

<sup>5</sup> 按：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8月26日，时在《七三布告》发布50多天后、也在对四二二的“剿灭”结束后。有人提出：何以整个《七三布告》后死的人占比只有60%不到，而内含的“革委会成立后”死亡占比却高达85%？其实细看处遗资料即可明白：这里所谓的“革委会成立后”并非仅指自治区革委会，各地、市、县分计的死亡数都是以当地革委会成立来分前后的。而各地市县革委会成立均在自治区革委会之前（第一个县级革委会成立于2月20日），而且（除桂林市等个别例外）均为韦国清支持的一派掌权，成立后即以剿灭当地四二二为第一任务。到《七三布告》发布时大部分地市县的剿灭已经完成。剿灭过程中各地县四二二成员大量逃亡南宁、柳州、桂林等大城市。《七三布告》发布后这些城市的四二二也被剿灭，自治区革委会遂在“捷报”声中成立。所以，各地革委会成立后的死亡数比《七三布告》发布后的死亡数更大是很自然的。

虏”、“贫下中农法院”屠杀“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的。

官方“处遗”文件称：“从以上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十年期间（1）广西杀人多是在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2）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以杀害的。”<sup>1</sup>

官方文献还指出：“《七三布告》下达后的杀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如桂林地区文革期间死亡人数 11918 人，（其中）在《布告》后死亡的 9087 人，占死亡总数的 90% 左右。宾阳县由于县革委主任、（驻军）694 师副师长王建勋等积极贯彻《七三布告》，仅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十多天里，就打死逼死 3681 人，占该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人总数的 90.34%。南宁市在贯彻《七三布告》的很短时间内，仅围剿四二二据点解放路等就打死 1558 人，为《七三布告》前死亡人数 261 人的六倍。”<sup>2</sup>

发布《七三布告》据说就是为了“制止武斗”，但事实是这个《布告》导致了广西血流成河，死了比《布告》之前多得多的人。至今为止宣传的文革图景，都是说“造反派”如何造成乱世，尤其是“造反派的武斗”为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处遗”资料以铁的事实表明：至少在广西，当权派和所谓“老保”镇压造反派，远比造反派野蛮和残暴得多（造反派当然也相当野蛮，这是我这个曾经的造反派群众从不想置疑的）。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乱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虐杀；不是死于党政在“造反”中瘫痪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政权，实际上无论广西还是全国各省，林彪垮台前绝大多数是军人主导，林彪垮台后“军政府”色彩明显弱化，文革前官员成为主导，但无论哪个时期，“群众组织”代表都只是跑龙套的，不要说造反派，就是如广西在镇压了四二二之后进入革委会的“老保”组织功臣虽然算是飞黄腾达了，也仍然是跑龙套而已。

### 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标本

---

<sup>1</sup>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 年）第 7 册，127 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sup>2</sup>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 年）第 7 册，128 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广西的事如今已经相当有名。我们不必寻找什么民间野史和回忆之类，1980年代广西官方编辑整理的处遗资料中，当年镇压四二二时令人发指不忍卒读的残酷场面就连篇累牍堆积如山。诸如逼迫儿子当众亲手砍杀自己父亲（永福、都安、巴马等县）、残杀被害者后又强奸轮奸其妻女，奸后杀死并剜乳割阴、取肝而食，满门抄斩并洗劫房屋财产供凶手私分（武宣、蒙山、邕宁、融水、浦北等县）、杀人后变相贩卖其妻女勒索“改嫁费”（浦北、资源等地）等等。正如读过这些“处遗”材料的人形容的：“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杀父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sup>1</sup>请问在整个文革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造反派迫害走资派”何时、何地、有哪一次残暴、野蛮、血腥到如此程度？

处遗材料还证实，当时广西共有武宣、灵山、隆安、天等、浦北、上思、武鸣、崇左、马山、钦州、合浦、上林、邕宁、容县、宾阳、都安、忻城、钟山、来宾等19县和柳州市发生了杀人后挖食肝胆及人肉的骇人事件——而且很多地方是成批地、有规模地发生：隆安发生21起，灵山发生25起，武宣竟达75起。后来曾有人说这与广西少数民族的落后传统有关，并特地指武宣县70%人口为壮族。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笔者根据处遗资料中“吃人”事件的地点和规模在广西民族分布地图上作了标注。如下：（△表示地点，其大小表示吃人事件的数量）



图中明显可以看出：广西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况是东部主要为汉族，西部少数民族为主，由西至东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递减、汉族比例递增。而那些极端残忍野蛮的吃人事件全部发生在中、东部的汉壮混居地带，其中吃人案例次多的灵山和浦北、钦州、

合浦、容县等地基本是汉族区，少数民族人口极少。而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经济社会也最不发达的西部（百色、河池两地区）反倒没有这种事。

进而论之，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民族分布是1950年代“民族识别”运动和后来的政策下形成的，实际上就文化、社会特征论，广西真正具有原生态民族特点

<sup>1</sup> 《广西文革武斗惨况》，[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4411668/2717/93/77/6\\_1.html](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4411668/2717/93/77/6_1.html)



的地方只有西部的百色河池一带，中东部居民无论血缘上的“族源”如何，实际文化社会状态早已高度汉化。按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口径，广西只有 63 万左右的少数民族<sup>1</sup>（其定义与我们现在不同，如白崇禧是穆斯林，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回族”，而只认为是信伊斯兰教的汉族，与信基督教的蒋介石也是汉族一样），基本都在前述的西部，文革中那里根本没有发生吃人事件，而吃人案例最多的武宣按这一标准其实也是汉族（至少是汉文化）区。

显然，文革中广西的吃人惨剧与“民族文化”没什么相关性，那么它与什么相关？处遗资料明确显示：武宣县被吃者 75 人都是造反派四二二成员、倾向四二二观点的干部、群众，以及根本没有派别表现但却被指为造反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及其家属，包括支持四二二的 2 名党员、3 名干部在内。而参与吃人的 130 人中，居然有党员 91 人、干部 45 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 21 人。吃人案例第三多的隆安县同样如此：参与吃人的 41 人中，党员 36 人，干部 8 人，“群众”只有 2 人；处遗时该县因吃人罪行被处分、判刑共 21 人，居然全部是党员，三人是干部。<sup>2</sup>根据处遗-整党总结时统计，当时全广西共有近五万党员在“非武斗”状态下参与杀人，其中 20875 人是入党后杀人，9956 人因杀人“有功”入党，17970 人“与杀人有牵连”。根据“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处遗的结果是全广西共有 2.5 万党员被开除党籍。<sup>3</sup>

很明显，这种暴行的来源是二位一体：一是文革前就不断宣传并步步强化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观念及据此在社会上制造的以“出身”、“成分”好坏区分贵贱的现代种姓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走向极端就变成了“高种姓”对“低种姓”的虐杀。二是文革前期当权派以地方驻军、各级武装部和官办民兵组织、基层政权为依托，组织、支持、发动所谓“老保”对触犯了他们的“造反派”实行报复性镇压。而这些造反派有的纯粹因为相信了某种上边灌输的说法而“奉旨造反”，有的则与过去积累的官民矛盾和体制积弊有关。尽管真正的低种姓贱民极少敢参加“造反”，造反派也尽可能回避这些人，但是他们的对手总是要把这两者归到一块，以便于镇压。

广西的暴行之残酷程度固然极端而罕见，但其基本行为逻辑却并不罕见。如闻名的湖南道县大屠杀，过去尽管其残暴已广为人知，但其原因却极少分析，甚至常常归之于“造反派杀人”。后来详情披露：其实恰恰相反，当时的情况是湖南省城造反派“湘江风雷”崛起后，“老保”势力强大的湘南各县基层组织以武装

<sup>1</sup> 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度广西统计年报》。按此为民国时期广西人口统计中少数民族（时称“特种民族”）最多的一次，还有几次人口统计的少数民族人数和比例更少。见卢露：《从桂省到壮乡：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壮族》，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59-60 页。

<sup>2</sup> 黄家南：《血雨腥风的岁月——广西文革实录》，2014 年自印，556-562 页。（此书实为处遗档案 18 册的资料摘编）

<sup>3</sup> 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开放》2013 年 10 月号，75-78 页。

部、官办民兵为支柱，为“防止湘江风雷下乡”，在镇压当地弱勢的造反派之余，对被指为造反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和其他贱民“先发制人”实行斩草除根的屠杀，据说这可以阻止造反派势力蔓延。<sup>1</sup>实际上，道县所在的湘南与广西接壤，广西北部很多地方的屠杀，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之类，都是湘桂两地互相交流、互相取经的。

这种当权派假手所谓“老保”残害“造反派”的事件，当然不止发生在广西和湖南。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收集了湖南道县大屠杀、内蒙古内人党大血案、广西四二二被剿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北京大兴县惨案、云南沙甸事件等共七宗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其中除大兴惨案发生于尚未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的1966年“红八月”、内人党与沙甸事件事涉民族关系外，其余四宗屠杀都是发生在1967-1968年的大乱期间，而且都是当权派屠杀“造反派”和被莫名其妙指为后者社会基础的“黑五类”。

## 两个极端之间：造反派的共同命运

清华的情况当然与广西大有不同，死亡的规模也完全不可比，但耐人寻味的是不少人也指出：以“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为由头进入清华的工宣队，在其掌权时期，清华的“非正常死亡”也比蒯大富得势时更多！

当然，广西的情况不仅与清华，与其他各省相比也有些特别之处。最明显的是广西文革前第一把手韦国清文革中成立革委会后仍然是第一把手。当时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都曾倒台过，全国类似韦国清这种情况的仅有河南的刘建勋和黑龙江的潘复生。<sup>2</sup>但是，刘潘二人都是得了内线消息第一时间出来支持当地造反派的弄潮儿，随着形势变化后来实际掌权的时间也不长，唯有韦国清从未支持过造反派，而且一直主政广西，他到广州和北京高升后，广西的权力也一直在他扶植的亲信手里，直到1983年中央为解决广西处遗问题专门调整自治区领导班子前，广西实际上一直在他的势力控制下。

不过，人们切莫因此以为韦国清是个中央奈何他不得的地方“诸侯”或“藩镇”，传说他因为与越南有特殊关系所以为中央所仰赖，更是没有道理。<sup>3</sup>韦国清是广西壮族人，而且是广西右江苏维埃红七军出身，有人因此认为他的执政有地方或民族或红七军背景，甚至称他为“邓小平（红七军领导人）嫡系”、“中共的桂系”、“广西王”或“壮王”。但实际上，韦国清在当时广西人心中主要是个

<sup>1</sup> 参见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sup>2</sup> 刘建勋当时已调离河南，但由于继任的文敏生不受中央文革信任，又被中央派回河南去取代文并支持造反。潘复生则是从哈军工的一些“通天”人物中得到消息，出来领导“东北的新曙光”的。

<sup>3</sup> 与外国（哪怕是亲密的“兄弟国家”）有特殊关系，对中国高官尤其是封疆大吏而言恰恰是惹祸的大忌。

“南下干部”，他治桂的最大特点恰恰在于一直以严厉打击“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为动力取悦于中央。从某种意义上讲，韦国清可以说是“广西的斯大林”：他作为壮族人却依靠“南下干部”用中央集权主义打压壮族人，就如当年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以“比俄罗斯族更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来镇压格鲁吉亚同族一样。关于壮族，韦国清的名言是：“壮族（与汉族相比）没有特点，依我看，这恰恰是壮族的特点，这正是壮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地方”。据说他曾要求《刘三姐》主角的服装不要突出壮族特色，而要突出“劳动人民”特色。<sup>1</sup>

从1955年在广西任职以来，韦国清都极善于揣摩圣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来干部和“南下干部”。广西地下党、边纵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红七军老战士”乃至他故乡东兰凤山一带的壮族乡亲被他整得最厉害。“壮王”、“二壮王”曾是他扣给地方干部的帽子。而凤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sup>2</sup>）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文革中也被韦屠杀得最厉害——全县人口1.3%死于非命，死人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149人遇害。<sup>3</sup>韦国清的东兰壮族同乡兼红七军老战友韦祖珍文革中被中央调回广西与他搭档做第二把手，没两年就被韦国清借“九一三”事件之机打成“林彪死党”，几乎整死。<sup>4</sup>韦国清的老首长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在苏区肃反中被冤杀，延安时期已平反并宣布为烈士，1949年后其在广西的家属因此很受尊敬，但文革时韦国清和广西当局在带头“批邓”<sup>5</sup>的同时又宣布李是反革命，“大有鞭尸扬灰之势”，家属也被整得“家散人亡”，<sup>6</sup>直到韦国清调离广西、文革结束，经邓小平直接过问，才恢复了历史的公正。又如而今闻名天下的“壮族歌仙刘三姐”，本是源自广东汉族地区的民间传说，传入广西后于1950年代末被当时广西区党委文教书记、广东籍汉族干部伍晋南调集文化力量将其打造成广西壮族的“文化名片”。可是文革中韦国清狠整伍晋南，炮制“大毒草”《刘三姐》成为伍的大罪之一，整个文革十年中这“壮族歌仙”一直被“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国清封杀……

韦国清何以能成为“政治不倒翁”是另一个话题。这里要说的是：他在广西

<sup>1</sup> 蒙雄强：《壮族上将韦国清的点点滴滴》，《文史春秋》2010年第3期。

<sup>2</sup> 当地又有“三老”之说，即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总之也是参加过右江苏维埃运动的老人。

<sup>3</sup>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5册，195-196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sup>4</sup> 所谓“林彪死党”到底能否成立，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固然与林彪关系密切并与张春桥江青等人有矛盾，但是否与林共谋反毛，这都是历史上的疑问。但无论如何，黄吴等人至死都未能翻案。而韦祖珍文革后很快获平反，可见他与林系其实没什么瓜葛，其被整完全是因为他那个老乡的构陷。有趣的是，平生转战南北的韦祖珍只回桂工作了两年就被韦国清赶出广西幽禁他乡，临终仍要求落叶归根并终于葬在了广西，而主政广西20年的韦国清却化桑梓为怨府，最终选择了北京作为他安息之地。

<sup>5</sup> 韦国清本人不仅在1967年1月出面具名“揭发”邓小平，1976年广西当局（其时韦已升迁，继任者为其提拔的安平生）还先于全国率先点名批邓、并建议中央在全国公开点名。1980年代的“否定文革”理论上是要否定造反派的，在广西“处遗”却主要是为造反派讨公正，这样的处遗能够实现，除了直接过问广西问题的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李锐等人可贵地坚持了实事求是外，也与广西当局这次跟风失算有关。

<sup>6</sup> 李秉元：《沉痛悼念我的父亲李明瑞烈士》，<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64/145228/8953925.html>

的作为并不是一个“土司”、“诸侯”的行为，反映的也不是什么地方或民族的“传统”，而就是一个成功揣摩圣意的跟风者、一个极权体制下地方官僚的无法无天，这在当时不能说没有代表性。只是由于韦国清从未失势，反对他的造反派广西四二二也就从未像“井冈山”在清华那样一度得势。广西因此也成为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一个极端典型。而在清华，文革初期工作队打倒了蒋南翔，毛泽东又打倒工作队并扶植蒯大富得以称霸清华园一年多。但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蒋南翔与工作队是一回事而且从未倒台（假如清华有个“韦国清”），蒯大富（假如他还会“跳出来”做清华的“四二二”）的遭遇又会如何？

在清华，工作队扶植的“保爹保妈派”狠整过蒯大富，但他们很快就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干预下垮台了，后来的清华严格地说没有典型的“老保”。四一四是从“井冈山”中分裂出来的，当然，从“四一四思潮”重建文革前秩序（“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的想法看有点接近于“保”，但基本上还是被毛泽东看成造反派中的异端，后来和团派同归于尽都被毛泽东卸磨杀驴了。不过几年后（请注意：无需40年）回头看，老四的人还是比老团的人更能被体制接纳，但比他们两者都更能干的，还是当年的“老保”。那么，假如“老保”始终没垮，清华园又会是什么样呢？蒯大富等人又会如何？

在当时的中国，清华与广西几乎是两个极端了：由于在皇城根下直接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扶植，“老保”早就没了踪影，造反派之得势天下第一，“百日大武斗”中蒯大富亟欲踏平四一四的气焰与广西“老保”踏平四二二的声势一度近似——但仅仅是“一度”。别看毛泽东在“召见”时贬损四一四，但毛泽东其实是绝对不容蒯大富踏平四一四的（否则十个四一四也不可能“绝处逢生”！）。然而，毛泽东却非常乐见广西“联指”踏平“四二二”。如果说在清华这一个极端中造反派的下场最终也还是比“老保”惨（请注意，我这里指的不是他们在邓小平时代的下场，而是指在毛泽东时代的下场），那么处在另一个极端的广西四二二下场就不必言了。

事实上，无论韩爱晶、蒯大富们如何自命为“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竭力与外地那些“不可靠”的、在野的、弱势的造反派划清界限，最高层还是把他们归为了一类。从林彪那句“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足可见这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何等牢不可破！尽管蒯大富与广西四二二毫不相干，蒯大富之曾经得宠于毛泽东和韦国清始终恨四二二入骨更是两个极端，但就是因为那个其实蒯大富与四二二都并非主要角色的“清华、北航黑会”，他们还是最终被搞到一起了。其实，即使没有这个“黑会”，他们的命运也不会有多大不同——正如“七二七”蒯大富“误判”了而韩爱晶并未误判，但他俩的命运也没有多大不同一样。

其实，这个“黑会”虽然被当局强加了莫须有的“重要性”，但当时各地造反派，无论曾经得势的还是从未得势的，都感到大难临头，纷纷来京鸣冤求救，以至于聚到了一起，这还是非常富于象征性的。据说当时北航红旗的祝春生在会上曾大骂那些与会的“不可靠的”外地造反派，说他们“反军”惹祸，还自夸我们北航红旗从来不“反军”，从来跟解放军保持一致，所以能够屹立不倒。而且据说康生看了这个发言记录还说讲得好——可是话音未落，祝春生还是进了黑牢，<sup>1</sup>并没有比那些“反军”的家伙幸运多少。

### 上海并非例外：论王洪文何以持续受宠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其实按英明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1967年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只是由于武汉七二〇事件陈再道的意外犯上，毛泽东、江青又“额外”地宠了一次造反派。但是没过多久，“伟大战略部署”还是回到了原定的轨道。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利用造反派狠整刘少奇等他假想的政敌，主要是在北京的事。因此他宠幸北京造反派倒还是比较特殊的。这一点就是上海也比不上。人们一般都以王洪文为造反派得宠的典型，其实，王洪文之所以能够在毛生前一直得宠，恰恰是因为他这个“造反派”非常另类，非常不典型。有人认为毛泽东抛弃蒯大富而久宠王洪文，是因为毛的意识形态重工人而轻知识分子。其实大不然。当时工人造反派比学生栽得更惨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一月风暴”以后，各地对造反派卸磨杀驴大都就是从“工总”之类的工人组织、而不是从学生组织开始的。

2

而王洪文能够持续得宠的主要原因，既不在于他是工人、也不在于他是造反派，更不在于他是“工人造反派”。他主要就是因为死保张春桥，而与张的得宠共始终。至于他反对刘少奇，甚至他反对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上海的“走资派”，则与他的“工人”身份<sup>3</sup>一样，都不是他持续得宠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身在上海的王洪文不仅对打倒刘少奇没什么贡献，甚至在上海的造反中他本来作用也不是最大的。他原是上棉十七厂的保卫干部，直到1966年11月间“造反”大潮形成、旧市委垮台已成定局时他才出来参与组织了“工总司”。

---

<sup>1</sup> 戴维堤：《逝者如斯》之73《北航黑会》，乌有之乡网站

<sup>2</sup> 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尤为典型。各地军方“支左”后，收拾造反派大都是首先拿工人组织开刀，因为学生社会经历相对单纯，不易找到把柄，而工人，尤其工人中那些呼风唤雨者往往经历相对复杂，当局镇压较易找到借口。所以1967年后各地的“逆流”和“反逆流”常常是以军方首先把工人组织打成“反革命”，而学生造反派为之打抱不平，与军方发生冲突的模式演进的。

<sup>3</sup> 王洪文其实是保卫干部，并非真正的工人。不过当时工人组织的头头很多都如此，如湖南的叶卫东、湖北的朱洪霞、广西的白鉴平等。其实就是传统的工人运动中，出头“代表”工人的往往也不是工人，如当年安源的李立三、江岸的施洋，只要真出于工人的推举授权，其工人代表的资格就不是问题。有趣的是文革中工人造反派被镇压时，不是工人的头头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宠的王洪文自然没有此厄。

不要说与北京早在这年初夏就奉旨发难的聂元梓和奉旨前就先忤逆了王光美的蒯大富相比，就是与上海最早起来造旧市委反的复旦“红革会”等学生组织相比，甚至与上海工人中先于他而造反的潘国平等相比，王洪文的“造反功劳”也不是很大的。他崛起的奥秘就是在安亭搭上了张春桥，而后王张投桃报李又搞掉了其他造反派——先是王洪文力保张春桥，镇压了炮打张氏的“红革会”等“老造反”，再是张春桥支持王洪文，血腥镇压了反王洪文的造反派“上柴联司”（及上柴之外的“支联派”）。

除这两个镇压外，也许并非更不重要的是一个镇压，即早在“一月革命”时就成为“上海特色”的镇压“经济主义”，<sup>1</sup>正是这三个镇压而不是他先前的“造反”，决定了王洪文能够继续高升。尽管当时楞说“经济主义”是“走资派”煽动的，但谁都知道那恰恰是“造反”与老百姓（尤其是下层百姓）利益相关的部分，如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返城、荣复转退军人要求改善待遇等。但凡“造反”如果在为高层权争火中取栗之外还有百姓自己的利益诉求，那就是“经济主义”。反“经济主义”是典型的矛头向下，与“造走资派的反”完全相反。如果说厂保卫干部镇压临时工也叫造反，那与“贵胄红卫兵”殴打“狗崽子”的“造反”有何区别？为什么后者就叫做“老保”？而今天的“城管”抓小贩也可以叫“造反”吗？

这里有争议的可能是“上柴联司”，今天它被研究者认为是个十分特殊的案例：它主要由草根群众与“17年受压制者”组成，而且反对本厂领导，这与当时“造反派”一般社会学特征相符。其对立派则多党团员与政工干部，更像是“保皇派”。但由于上层矛盾的特殊原因，上柴联司迟迟未卷入对上海市委的“造反”，很多成员还参加过市里的“保皇派”（即“赤卫队”），而其对立派则投靠工总司，更早参加了市里的“造反”。因此一些人把上柴联司视为“保皇派”，王洪文后来镇压它时也是这么说的。<sup>2</sup>其实，由于官场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当时的组织对一个或一级官府造反，而对另一个或另一级官府亲近，是常有的事，何况联司作为整体也并未参加过“赤卫队”，倒是参加过工总司（只不过参加较晚，而且主要联系的是工总司中与王洪文内讧的那些人），更重要的是，到1967年1月后，还有谁不造旧市委的反？笔者认为从群众性“造反”体现出对“17年”官僚体制不满这一点看，定义“造反派”应该主要看社会学特征和意识形态背景，而不是看对某个具体当权者的态度。对17年体制（有时未必是对整个体制，而

<sup>1</sup> 北京的造反从未提出反“经济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也不指望他们提出，因为毛对他们的利用就是为对付刘少奇。上海则不同，没有张春桥点拨下的这个“创造”，“一月革命”是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位的。后来各地仿效上海的“夺权”基本都失败了，取代旧党政的“革命委员会”基本都是“军政府”或广西那样的“旧政府”，上海则不是，因为早在“反经济主义”时基于百姓利益诉求的“造反”在那里已经消灭，而在其他地方都是要靠“军政府”或“旧政府”来消灭，才能建立“新秩序”的。

<sup>2</sup> 参见李逊：《砸“联司”大武斗之前——上海柴油机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形成及社会化过程》，<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262.html>

是对自己在体制下的具体生存状态，比如受工作队的压制等）不满，但又接受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并以此为“造反”理由的，就是“造反派”。——如果对体制不满而且反对当时的意识形态，那在当时就算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而不是“造反派”了。

就此而言，上柴联司无疑属于造反派，而且比王洪文更典型。另外，“造反派”在当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当时特殊形式的组织多元化的产物，大一统的官办组织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不能说是“造反派”。从这一点看，1967年8月上海的“造反派”也应该是上柴联司，而不是王洪文及其工总司。

换言之，与其说王洪文与蒯大富类似，不如说“上柴联司”与广西四二二更类似。1967年盛夏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武汉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镇压“三钢三新”与上海张春桥支持“工总司”镇压“联司”派，性质其实差不多。毛泽东当时对两者的态度截然相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陈再道这个莽汉冒犯龙威惊了圣驾，而张春桥又恰恰是毛的近臣。但是这样的截然相反造成政策混乱，近一年后才调整过来，于是武汉的“三钢三新”也被抛弃了——而在武汉以外，这一次不但“四二二”的结局比上柴联司更惨，连“清华井冈山”也成了上柴联司的北京版——蒯大富看到数万工宣队进校时，顿时想到的恰恰就是工总司踏平上柴的情景！<sup>1</sup>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把“清华井冈山”作为造反派一度受宠的极端，而“广西四二二”作为造反派从未受宠的另一极端，那么清华这一极端其实比广西更特殊、更不普遍。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甚至包括过去常被视为造反派持续受宠典型的上海在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都更接近于广西，而不是更接近于清华。当然，即便是清华，最后也是在发展方向上（尽管不是在残酷程度上）向广西看齐了。

### 余论：领袖利用了造反派，还是造反派利用了领袖？

回顾清华文革与广西文革的往事，令人叹息更令人深思。作为两个极端，似乎再也没有比清华造反派与广西造反派差别更大的了，不说早先的受宠与否，直到七三布告发布时，四二二在广西正被别人“踏平”，而“井冈山”在清华还要“踏平”别人，但这么大的差别也没有避免他们很快还是殊途同归都被毛泽东镇压下去。而对于武传斌发起、北航主要接待的“黑会”而言，清华井冈山和广西四二二其实都算不得主角，而且事实上两者并没有联系（两者都只是各自与武传斌有接触），但在中央首长嘴里，事情却变成了广西的“土匪”进京向清华的“黑

---

<sup>1</sup>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43页。

司令部”“汇报”！更怪的是“黑会”的真正主角武传斌蒙受的后果也远没有清华人和广西人那么惨：武传斌后来三进三出牢房，但时间都不长且始终未获刑，而清华老团获刑者累累，四二二更是被浸在了血海里。很多人都说清华文革在全国文革中具有最突出的典型意义，其实，就造反派先受领袖利用后被领袖镇压而言，清华无疑是造反派被利用的典型，广西则是造反派被镇压的典型。两者合起来倒是构成了中国文革最完整的典型图景。

对于像广西四二二那样的造反派被残酷镇压和野蛮屠杀，今天是怎么谴责也不过分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四二二就是正确的。“奉旨造反”结果却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固然可悲，但他们所奉之旨也很不人道，他们也喝过“狼奶”，得势起来也会很凶，就像清华井冈山得势时那样。广西四二二作恶远比镇压者少，原因并不是他们的主张正确，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势的机会罢了。我一直认为，无论就 17 年极权体制下积累的官民矛盾，还是就“五十多天来”当权派首先发动“反右式文革”整老百姓（如工作队整蒯大富）造成的新民怨而言，文革中的群众“造反”形成如此规模，并不能仅仅用“奉旨”来解释，它是有社会土壤的，即使今天看来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这就犹如旧时的农民反官府一样，值得同情并不意味着它（如海外一些“人民文革”论者所言）就是“民主派”。把中国文革时的造反派混同于波兰的团结工会是完全不对的。在当时的中国，有社会土壤的造反仍然得“奉旨”发难，值得同情者也做了不少火中取栗的傻事和乌烟瘴气的坏事。不过这是领袖利用造反派作恶（利用完又镇压了他们），而不是造反派利用领袖作恶，这个基本事实是不能颠倒的。现在看来，当时完全没有被利用的“造反”恐怕只有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中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镇压下去的“经济主义”造反，最底层的劳动者要求改善待遇，不仅在“社会主义”之下应该天经地义，“资本主义”也都还承认劳工运动合法呢。即便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也不能剥夺他们提出要求的权利吧！然而当时不仅王洪文这种“另类造反派”，就连红革会这样的“典型造反派”也参与了镇压“经济主义”，可见中国一般造反派与“人民文革论”所说的“民主派”距离有多大。

揭示这些真相的意义重大。1980 年代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本是对的，但当时的历史局限决定了这一“否定”仍然是基于当权派利益本位的立场，因此不仅“彻底否定”其实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也有失公正：那时的“否定文革”主要就是“否定”造反派，文革被描述成“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单一图景。以至于文革过去 40 多年后，年轻人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整‘走资派’，邓小平抬举‘走资派’肃清‘造反派’”。这个“事实判断”很少有人质疑，双方只是价值判断相反：有人说毛主席支持人民反官僚是对的，有人说老百姓犯上作乱不行，邓小平平定造反才对了。如果只是在这样的“事实”上讨论，



那就永远不能搞清文革灾难的教训、也没法认识改革的意义。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就是傅高义这样的外国学者也如此，他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仍然把迟群等人称为“造反派”，<sup>1</sup>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毛泽东派来镇压“造反派”的——但是迟群治下被整死的人却要比“造反派”蒯大富治下更多。

文革中当然有“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一幕，但绝非仅仅有这一幕，而且如果我们承认“十年文革”之说，那么这一幕其实非常短暂。重要的是几个被忽视的“真相”：“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那时镇压他们的人往往更野蛮，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造反派”的受难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而就造反派本身来说，他们受难最惨的主要是在毛泽东时代，而非邓小平时代。

另一方面，“走资派”（老干部）长期受大难、改革后才解厄者固然不少，但其中受“造反派迫害”只是一瞬，90%的时间他们是受的“常规党内迫害”，与根本没有造反派之说的苏联克格勃黑狱没什么本质区别。“彭陆罗杨”受难时，“造反派”还远没有问世，而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到1976年，难道那是蒯大富关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名实”分离，说的与做的相反。正如今天几乎100%的当年“右派”都已平反，但“反右”仍被认为“必要”一样，当年毛泽东把95%的“造反”者都收拾了，理论上“造反”却仍被说成是对的。而与毛生前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相比，邓小平时代虽然理论上整体否定了造反运动，并清理了一些“三种人”。但不仅这种处理无法与毛泽东的镇压相比，而且事实上，大量造反派的冤案却是在邓时代得到纠正的。关于文革，无论是官式的“彻底否定”还是“毛左”的“毛主席支持民众反官僚”论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把“造反派”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事绝大多数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而不是在邓小平时代。而真正带有“人民文革”色彩的造反，如前述知青要求回城之类的“经济主义”造反，毛泽东时代不但官府镇压，主流“造反派”也排斥之，反倒是在改革初期，很多这类“造反”取得了成功！

邓小平时代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把残留在党政机关中的一些曾经的造反派予以驱逐，一些人还被判了刑。但其实到1976年时仍然得势的“造反派”人士不但已经极少，而且大都像王洪文那样以镇压其他造反派的方式交过“投名状”，实际上已不再是造反派而只是文革新贵。这场“清理”对“造反派”的打击其实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镇压。更有不少如蒯大富这样的人其实在毛泽东生前已经坐牢很久，但那时盛行的是不讲任何理由和程序的随意关押、无限期的黑牢；即使放出来也是“黑五类”式的贱民，无法拥有正常生活。邓小平时代开始讲“法治”，把他们正式审判定罪，判了刑期。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那种审判实际还

---

<sup>1</sup>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121页。

是“政治挂帅”，“法治”水平很低，也未必公正，但由于此前的羁押折抵刑期，他们中不少人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坐牢的时间还长于邓小平时代。出狱后尽管也受到歧视，但程度比毛泽东时代对贱民的歧视差得远，他们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生活。

更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时代虽然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在毛泽东时代受到理论肯定的“造反派”，实际上却有很多毛泽东时代镇压造反派的冤案，是在邓小平时代被平反的。这实在是历史的吊诡！例如改革初年获得平反的最出名的几个文革中遇害的异议人士（有的平反后被宣布为烈士），当年他们其实并非同一立场，其中因反对打倒刘少奇而被害的张志新自然不是造反派（她应该算“保守派”），但遇罗克（因编辑造反派的《中学文革报》反对保皇派的“血统论”而遇害）、李九莲、钟海源（都在军人政权镇压造反派时遇害）等多数人其实都属于造反派。还有那些活着的人：武汉的鲁礼安、湖南的杨曦光（即后来名满天下的杨小凯）、广西的钱文俊等，他们不仅是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中最激进者，他们都是毛泽东时代坐大牢、邓小平时代获平反的。

那时冤死的人除了“贱民”以外，肯定以造反派居多——至少比“走资派”和“保皇派”多，这些被平反者自然也是如此。典型的是笔者的家乡广西等地，文革中对“造反派”成千上万地大举屠杀，可谓惨绝人寰。那也是邓小平时代被平反、得以恢复公道的。1983-87年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在那里是无人不知的一个词。处遗中被惩罚的一些杀人者按当时的政治口径都被指为“造反派”，其实他们固然罪有应得，但说他们是“造反派”就与事实刚好相反了——他们是文革前当权派的御林军。而大量的广西“造反派”恰恰是在邓小平时代从地狱回到人间的。

因此就不难理解，尽管今天有不少不懂历史的年轻人从“造反派反官僚”的角度同情文革，但实际上在1970-80年代之交，走出文革、实行改革是包括绝大多数前“造反派”和“走资派”在内的几乎所有国人的共识。只是当时改革主导者是复出的当权派（文革中所谓的“走资派”），按他们的意图进行的改革固然基本上符合上述共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偏见和扭曲还是不少，改革之路远比当时人们想的复杂和坎坷，对文革的反思自然也是如此。这也就是孙怒涛先生主编本书的意义所在。

---

【书海泛舟】

##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历史引论

唐少杰



作者简介：唐少杰，1959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左图：2011年10月14日，唐少杰与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在山东大学会议中心合影。）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在整个文革历史中占有非同小可的地位，具有超越除了中共中央以外的全国文革所有单位、部门和机构的独特角色，对于整个文革的兴起、深入、转向和衰变起到了直接相

关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在文革的实践上还是在文革的理论及其思潮上，清华大学的文革都是富有典型意义和典型特征的“活化石”。<sup>1</sup>

清华大学文革十年历史大致上可分为六个阶段，这些阶段与整个文革历史密切相关，并以清华文革的六个独特而深重的事例为标志：一、1966年5月底至6月初出现的“红卫兵”与同年8月开始的红卫兵运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二、1966年6月中旬至7月底的工作组问题和“蒯大富现象”及“五十多天”的文革初始问题，清华大学成为毛泽东与刘少奇

<sup>1</sup> 迄今为止，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研究已超过了中国其他所有大学文革历史的研究。至2014年5月前，关于清华大学文革的专著、回忆录、论文专辑及资料汇集计有以下十四种：1.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2.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4.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版；5.孙维藩：《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6.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版；7.唐金鹤：《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初版，2013年修订版，2015年全新第三版；8.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版；9.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10.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11.启之主编：《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台北，独立作家，2014年版；12.叶志江：《走出文革》，美国，溪流出版社，2014年版；13.陶德坚：《风雨人生》，多伦多，天下一家出版社，1997年版；14.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自印本，2011年版。另外，一些文献资料或著述的部分内容与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相关，参见：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一百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3.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11年版；5.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香港：中国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版；6.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7.杨继绳：《杨继绳：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版；8.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9.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10.李自茂：《毕竟东流去》，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在文革伊始分化的“前沿”；三、1967年初至次年7月底的清华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的斗争及论战，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百日大武斗”敲响了造反派运动及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拉下了文革群众运动的历史帷幕；四、文革“工宣队”模式。1968年7月底至1976年10月的清华大学工宣队问题是文革中、后期大学文革的重要范式之一；五、1969年至1976年的清华大学“教育革命”是文革教育乌托邦的一大“标本”，清华大学成为文革“教育革命”的首要基地；六、1975年8月和10月刘冰等四人两次致信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致使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标志着清华文革乃至整个文革走入穷途末路。

本文以上述六个阶段或事例为基点，评述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概论清华大学文革历史与整个文革历史的关联。

## 一、红卫兵组织与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红卫兵”。最初，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只是用来署名大字报的一个笔名。然而，红卫兵的出现既代表了清华附中乃至当时中国一种异常激进的青年思潮，又给文革初始的形势发展推波助澜，促使文革真正成为一场全民性的社会运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对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了清华附中甚至远远超出了清华大学。

清华附中红卫兵是1960年代初以来日益趋于极左的或极端激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必然结果。这种红卫兵最早是以名为“根红苗正”实为中共干部子女为主体的，他们要同已经激进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领导及其政策对峙甚至决裂开来，拉出自己的队伍，力求在教育资源或教育领域获得更大的利益、权力和权威。他们经过连续不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亦即“血统论”的政治教育及其鼓动，已经不满足于学习成绩优良，而要在政治上出人头地，利用“阶级路线”排斥或打击学业优秀的非干部子女。这批大致上与新中国同龄的并正处在青春期心理冲动和生理成熟的青少年们，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已不可能如同自己的父辈那样“打江山”，而只能力求“坐江山”。红卫兵问题的原初核心就是赤裸裸的“接班人论”及“血统论”。清华附中红卫兵把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军民纪念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所讲的那段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作为红卫兵的宗旨，充分表明了红卫兵自始通过毛泽东的思想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造反文化嫁接起来，确立并凸显了红卫兵组织和稍后的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现有文化体制和否定现有教育权威的取向。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通过北京大学 1966 年 5 月 25 日聂元梓等七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布为标志而正式爆发，仅过了四天之后，文革就通过清华附中而拥有了文革的突击队或生力军。文革在中国这两个最著名的大学得以成形和成势，绝不是一蹴而就或偶然意外的。红卫兵很快走出校门，杀向社会，致使红卫兵组织演变为红卫兵运动。经过 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群众，毛泽东真正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

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始，遇到了其手下的众多干部无所适从或难以响应的局面，这一局面被称之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sup>1</sup> 令毛泽东始料不及、喜出望外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横空出世以及所表现出“天兵天将”般的造反精神，使得毛泽东确实有了由社会基层来扩展文革、由青年学生力量来普及文革、由党外激进群众来深化文革的可能和必要。经过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而完全肯定和热烈赞扬红卫兵，红卫兵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开创出文革特有的“破四旧、立四新”的红色世界，就会全力以赴地去造就出无限热爱、信仰、崇敬、忠诚毛泽东的红色天地。

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是使毛泽东的文革自始得以在中国大陆全盘推行开来的一个必要条件。红卫兵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正如当时所言的红卫兵的最高红司令是毛泽东。正是有了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毛泽东的文革才会普及和深入到中国大陆社会的每一地区、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角落。红卫兵成为了文革的“政治推土机”。红卫兵的青少年成份使得红卫兵这支文革最初的政治先遣队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或杀伤力。红卫兵在大大推动和巩固了毛泽东的文革权威之际，也大大削弱了中共党的权威。毛泽东实质上利用或借助红卫兵来打破中共在文革初期的体制和权威，进而更有力地促使文革铺排开来。红卫兵问题本身深刻地显现出横贯整个文革过程的一大历史张力（tension），这就是可以称之为毛天下与党天下的紧张关系。无疑，文革之始，主要通过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实现了毛天下对党天下的全面驾驭和全盘超越。由此，中共中央上层的斗争演变为以红卫兵狂澜为主的平民大众日常政治生活的党外运动，中共自 1949 年以来的秩序、规范、机制和运作等等发生了重大嬗变。中共被迫地面对或接受红卫兵问题，真正表明了文革自一开始就不同于以往任何中共政治运动。

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政治指向和政治功能主要在于清华校外而多少有所不同的是，清华在 1966 年 8 月上旬出现的大学生红卫兵，基本上限于清华当时的文革形势格局，出现了若干红卫兵组织，最重要的有三个：一是 1966 年 8 月 8 日成立的“八八串联会”（后于 8 月 22 日成立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八八派”），二是 8 月 9 日成立的“八九串联会”（后于 8 月 19 日成立为“清华大学

---

<sup>1</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发[66]267 号；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 年。

红卫兵”，即“八九派”），三是9月24日（一说23日）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这三支红卫兵具有不同的取向。“八八派”与“八九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工作组问题”，即工作组的性质是什么？当时的文革运动斗争中心是批判工作组还是打“黑帮”？“八八派”指责工作组打击广大群众，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而不是阶级敌人及“反动学术权威”，偏离了文革路线；“八九派”维护工作组，坚持揪斗“黑帮”、“黑线”人物，打击新生的右派分子。主要由出身平民家庭学生组成的“八八派”与主要由高级干部子女所主导的“八九派”的一大不同在于坚持什么样的中共领导，即是否注重文革初始的政治血统取向，换言之，前者所注重的领导不是后者那种血统、爹妈、小圈子式的领导，而是中共对文革全局的总体意义上的领导。“八八派”自始就不同于“蒯氏人物”或“蒯派”以及后来的“井冈山红卫兵”，他们更多地是按照文革前的中共政治路线来进行文革。“八八派”与后来的“四一四”组织的形成和演变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但是，“八八派”并不能适时地推动清华文革深入发展。“八九派”实质上是工作组影子下的红卫兵，它要按照具有血统政治色彩的文革方式来进行文革，其最大的作为就是1966年8月24日及之后在清华实施的红色恐怖暴力活动，即摧毁“二校门”、殴打众多原清华干部和教师、撕毁斥责刘少奇等人的大字报、对一些干部和职工进行抄家等等，力图把文革的矛头转移到文革前的“阶级敌人”即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八九派”在清华文革众多红卫兵中命运不济，寿命颇短，它不过是工作组衰败、撤出后的化身或替身。

“井冈山红卫兵”是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关怀”的一支红卫兵，<sup>1</sup> 尽管它成立较晚、当时名声不大，但是它后来的演变却直接影响了文革初期的历史，直接决定了清华文革初期的进程。

“井冈山红卫兵”的名称就如同其形成之际的清华文革背景和其独特的经历那样，多少类似于毛泽东1928年秋所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所体现的红军崛起的背景。我把该词稍加改写，套用在“井冈山红卫兵”身上：校外旌旗在望，校内鼓角相闻，工作组围困万千重，蒯自岿然不动。早已怀疑一切，更加有志问鼎。“炮打司令部”炮声隆，报道工作组逃遁。

“井冈山红卫兵”的特色在于：它清晰而深切地意识到文革的未来更大发展应基于广大基层群众而指向文革更高更新的对象，它十分敏锐而适时地既给自己也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文革更加深入地推行下去。<sup>2</sup> 因而，它就超越了“八八派”，摆脱了“八九派”，成为清华大学所有红卫兵派别或势力中最符合文革真髓、最具有文革特性的一支红卫兵。它后来演变成“清

<sup>1</sup> 唐少杰 2010年1月19日采访蒯大富，未定稿，深圳。

<sup>2</sup> 参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第273-274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版。

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标志着红卫兵运动进入了更加广泛、深入和复杂的造反派运动。

从清华附中滥觞的红卫兵对于文革的另一“贡献”就是兴起和推广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和观念，使得一代激进青少年中学生和一代激进青年大学生普遍地滋长出无政府主义或反权威主义的心理，经过他们对“大民主”的渴望以及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向往，并加上他们本身所特有的造反有理、准救世主、革命万能、泛敌意识、迷信领袖、崇尚暴力、血统出身、道德专政、英雄主义、理想至上等等情结（complex）急剧地膨胀，进而直指他们周围几乎一切的社会规章制度及干部权威，并用他们唯有破坏而难有建树的狂热活动，既为文革的发动和推行，又为文革的普及和深入，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气息和生活氛围。

## 二、“工作组”和“蒯大富现象”

1966年6月9日，中共北京市新市委派驻的工作组的领导人来到清华大学，6月13日，工作组正式进驻，接管原来的清华党政领导职权。工作组体现了文革伊始刘少奇等人的文革政策和文革取向。毛泽东当时没有对工作组做出什么指示。刘少奇试图以过去中共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整合大学文革，旨在确保中共党组织或上级领导机构对于大学文革的控制。工作组依据中共1957年“反右斗争”的传统和模式，把文革当成了“新的反右斗争”。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共中央至今也没有对工作组问题做出结论。

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国高等教育部部长、北京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蒋南翔以及清华大学党政权力系统，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是文革初期整肃教育界及大学的必然结果。实际上，1966年6月初至工作组正式进驻清华，清华大学围绕着“反蒋”还是“保蒋”进行过大争论，这种争论很快就不以清华人尤其是不以清华干部队伍的意志为转移了。后来清华文革两派群众就曾争论过“蒋南翔究竟是被‘抛’出来的还是被‘揪’出来的”。显然，蒋南翔以及他麾下的清华干部队伍是文革最初的政治祭品之一。

工作组所肩负的批判清华旧党委、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文革最初的使命并没有成为清华文革初期的主流。工作组把在清华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和国家若干高级干部的子女作为进行文革的主力，这就很有可能使它自身脱离清华的基本群众。另外，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6月19日持中共中央办公厅介绍信来到清华工作组，她以“顾问”的身份指导着工作组，工作组成为她和刘少奇的文革死胡同。

稍后，工作组的命运既不掌握在刘少奇等手里，也不为工作组自身所支配，

而是开始断送在清华的一个普通学生即蒯大富手中！令工作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清华园的一只政治蝴蝶”——蒯大富改变了工作组的文化初衷即工作组所要延续的“反右斗争”的传统和取向，直至由于毛泽东的翻云覆雨而搅动并彻底改变了清华文革乃至整个文革的政治气候！<sup>1</sup>

蒯大富的问题直接源于所传的王光美当时要到蒯所在的工程化学系 902 班参加会议，而后来没有参加的事件。之所以称其为事件，是因为蒯及其同学们对于此事的追问“冒犯”了工作组的权威。不管工作组要不要向蒯及其同学们承认王光美参加上述会议的通知有误，工作组感受到了挑战，感受到了自己的地位遇到威胁。

1966 年 6 月 24 日晚，工作组在清华大礼堂主持召开的辩论会意味着工作组开始走向失败，工作组领导人自诩“代表了党的权威、代表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却没有赢得清华广大学生的信任，特别是工作组惯于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引起了众多学生的不满。蒯大富在这次辩论会上的发言及其引起的反响、他在此前后为抗议工作组所写的一系列大字报、声明和信件等，削弱了工作组的权威，并使工作组在道义上大丢其分。

蒯大富等对工作组的责问和随后同工作组领导人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背后却是蒯大富等当时所不知的同刘少奇、王光美的斗争，从根本上改写了清华文革初期党的领导模式，也从大方向上促使文革转入了与 1949 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大为不同的进程。这一进程就是以广大群众即草根阶层（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党政干部）为主干的进程。

为了遏制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批评工作组的浪潮，工作组在清华大学把 700 余人打成“蒯氏人物”即“右派”，造成三起自杀事件（其中一起未遂）。工作组在清华大学所掀起的反对蒯大富以及“蒯氏人物”的斗争，违背了毛泽东当时秘而不宣的文化主旨。工作组企图通过这一斗争来形成和巩固其在清华的绝对领导地位，但它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工作组在清华不仅没有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他们把他们所取代的原有清华党政干部打入“另册”，致使这些干部成为文革最初的对象。工作组的唯一依靠就是刘少奇的文化政策。工作组的失败是注定的，它只不过是受操控于中共中央权力机构的一个文革政治傀儡，它的种种做法加速使它走入了文革初期的政治坟墓。

当时在众多不满于工作组的清华学生中，蒯大富表现非凡，他几乎不妥协、不退让，在当时工作组所打成的众多“右派学生”、“反党分子”或“蒯氏人物”学生中，唯有蒯大富不向工作组“低头认罪”。工作组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开除他的共青团团籍、非法把他隔离、关押十八天等等，都

---

<sup>1</sup> 胡鹏池对此有着非常生动而深切的评述，参见胡氏著：《清华园的一只蝴蝶》，载《记忆》2013 年 1 月 31 日第 1 期（总第 92 期）。



成为他崛起的政治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工作组最大的“贡献”就是直接造就了文革的蒯大富，带来了“蒯大富现象”。<sup>1</sup> 蒯大富给工作组（实质上是刘少奇）的文革政策捅了一个大窟窿，尽管他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至少他的反工作组斗争很快就使清华文革具有了影响全国文革的作用和意义。

毫无疑问，蒯大富反对工作组的胜利从根本上来源于毛泽东的首肯和支持。1966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亲自来清华大学调查、了解清华文革问题及工作组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乃至在文革初期的路线、政策和方向上对刘少奇等人的巨大不满。周恩来同清华以及工作组一些人的谈话，特别是听取蒯大富长时间的谈话，最后向毛泽东所作的汇报等等，都为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以及撤销工作组提供了重要材料。在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转变上，周恩来的作用仅次于毛泽东，甚至这种作用更加直接、具体和关键。

1966年8月4日夜间，周恩来带着众多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领导干部前来清华，召开群众大会，批评工作组，给蒯大富平反，指导清华文革的进行。仅仅是在这个会议之后的十多个小时里，毛泽东就写出了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宣判了工作组的政治死刑。8月22日夜间，周恩来再次来到清华参加全校大会，并做了有关讲话。这再次表明清华此时的文革结束了刘少奇的作用而真正开始了毛泽东的主导。同时，这也再次表明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清华文革问题上等一系列重大文革问题上始终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仅吹响了向刘少奇的文革政策反击的号角，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运作和方向。毛泽东这篇大约仅有240余字的大字报，几乎完全是根据清华文革最初“五十多天”的经历而写成的。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把清华文革这“五十多天”的问题提升到了文革的全国性的全局和高度，亦即文革如何进行？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所通过的决定（“十六条”）对此给了强有力的明确回答：文革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大革命。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也解放了包括蒯大富在内的所有清华“蒯氏人物”。毛泽东这种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接解放被中共政治运动打成“异类”群众的举措，极大地焕发出了清华文革群众的政治能量，使得这些群众由衷地喊出了“革命倍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工作组的失败和蒯大富的胜利，直接带来的就是刘少奇等的全面溃退，尤其是蒯大富从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带领全体与会者的宣誓，到同年12月25日率领清华大学六千多师生员工在北京城区举行反对刘少奇的游行集会，蒯大富仿佛登上了文革政治的巅峰！如果说清华附中红

---

<sup>1</sup> 参见唐少杰：《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蒯大富现象”》，启之编：《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第101-107页，台北，独立作家，2014年版。

卫兵为毛泽东的文革提供了一支由青少年组成的开路先锋队伍，那么蒯大富则成为毛泽东决定向刘少奇的文革政策开战并把刘少奇打入文革政治悬崖绝境边缘的“重磅政治炮弹”。

值得强调的是，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发起并主持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斗王光美以及从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到北京市级领导机关、从清华、北大到工作组的大小三百余名“走资派”的大会，这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sup>1</sup>加重打击刘少奇势力的一大高潮。从当时的文革走势不难看出，这次公开批斗大会与同年2月在怀仁堂发生的中央碰头会的争论有着关联，因为一些中共中央元老派干部对于文革极其不满，招致毛泽东决定加大打击刘少奇的力度。同年3月底，戚本禹发表了斥责刘少奇的檄文，刘少奇的问题已成为敌对问题。蒯大富又一次抓住了历史的“时机”，主动请缨，请求周恩来同意清华举行批斗王光美的大会。这场驰名于当时国内外的、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大会真正标志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把刘少奇等划入文革的最大敌对势力。这一大会也是蒯大富反对工作组而大获全胜的顶点。战胜工作组、批斗王光美、反对刘少奇无疑确立了蒯大富成为文革初期的一大“标兵”。

蒯大富反工作组的斗争有力地促使红卫兵运动趋向并转变为造反派运动。尽管红卫兵运动的宗旨是“造反有理”，但这种造反在很大程度上是文革外围的造反或是教育领域的造反，还不是把文革的矛头指向文革最大对象的政治领域的造反。不同于早期红卫兵的造反，造反派的造反是文革更大、更广、更深意义上的造反。造反派的造反把文革最早的亦即“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红卫兵造反加以发展或修正，并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把原来主要限于教育领域以及青少年学生的造反扩展为中国大陆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和各个社会民众阶层的反权威体制、批判中共干部政治文化的造反。这种造反最后定格于中国大陆各省市以及以下地区、中央部级单位以及以下部门和机构的全民性的、全社会性的造反。

在所有文革造反派当中，蒯大富的地位和作用可谓“一花独秀”。相比之下，聂元梓等仅仅造了北京大学党委及其领导人的反，上海工人造反派只是造了上海市委及其领导人的反，而蒯大富所造的是以工作组为代表的刘少奇的反。在这个意义上，蒯大富是文革天字第一号的造反派！

### 三、清华大学文革两派群众组织的争论和冲突 “百日大武斗”

1966年底至1968年8月之前的清华文革群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缘起于

---

<sup>1</sup> “无产阶级司令部”意指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形成、演变的文革初期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力代表。

前述的“八八派”与“井冈山红卫兵”之间的分歧。工作组的失败和“八九派”的终结意味着清华文革1966年10月之后进入了一个与文革最初几个月明显不同的时期或阶段。“井冈山红卫兵”的出现不仅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张春桥本人的点拨或授意，而且它体现了文革意义上的群众组织的“正宗”，把握住了当时整个文革大局的要害以及清华文革的根本所在。尽管由于当时形势所迫，“井冈山红卫兵”在其成立最初的两个里，起色并不显著，但是后来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穷追猛打，充分显示了其他任何清华文革群众组织或派别都不可能超越它的角色和影响。

1966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及其总部，首次在形式上统一了清华文革的各派群众。该兵团当时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从更大层面上批判、肃清刘少奇的文革政策，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文革。然而，该兵团时运不济，仅成立三天，原“八八派”代表唐伟等三人宣布退出该兵团总部，这主要是由于该兵团总部主要领导人蒯大富的若干政策和举措所致。这一举动促使该兵团不断的分化，直至次年4月14日分裂成“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与“四一四串联会”（简称四派），后于5月29日彻底分裂成“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这两个组织的对立。

团派与四派的分歧、分裂主要在于具有不同利益关系和不同利益格局的清华群众如何理解和如何运作文革。两派在同一位文革最高领袖的统率下并在同一面文革意识形态大旗的指引下，所进行的文革思想的论战和文革实践的厮杀，成为文革群众问题的一大“景观”，成为整个文革历史的典型个案。

团派与四派的思想分歧和论战，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这种分歧和论战近似文革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或交锋。团派的思想完全是文革意识形态的“正宗真传”，而四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文革意识形态的“修正”或“异端”色彩。两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一是文革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文革究竟是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彻底砸烂论”、“改朝换代论”的社会革命，还是“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修修补补”的社会改良？

二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何在？文革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除了这些“走资派”之外，还包括文革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即“阶级敌人”？亦即文革的敌人究竟是“一小撮”还是“两小撮”？

三是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年）？这十七年历史是如同毛泽东所言的教育界及大学被资产阶级专政即“黑线专政论”，还是历史事实在于这十七年是毛泽东、共产党的天下即“红线主导论”？这关系到文革有无必要、是否必须的问题。

四是如何对待文革中那些原有的广大中、基层干部？工作组进驻清华后，把清华原有的干部队伍从整体上打入“另册”，把清华原有的干部几乎全部列入“另类”。工作组撤出半年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加大对刘少奇打击的力度，1967年3月底发表檄文，声讨刘少奇及工作组在清华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政策，<sup>1</sup>从而引爆了工作组所埋下的干部问题这颗“政治炸弹”。随之而来的争论就是：对于广大的清华干部是要“上‘揪’下‘扫’”，还是要“平‘反’平‘黑’”？是让他们“亮相”于文革，由造反派来决定他们的文革政治命运，还是对他们“一批二帮”，让他们归入文革，回到原来的岗位，发挥出类似于文革前的职权？最终，干部问题的群众化，群众问题的干部化，关系到文革是否为一场整治干部、批判干部的运动？关系到清华文革是由青年学生为主的造反派主导，还是由文革前的中、基层干部为主导？关系到在文革中要不要回归、重建或延续文革前中共的领导体制及干部队伍建制？总之，关系到文革的主体、方向和前途等问题。

五是如何对待文革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还是相反？以团派为代表的激进造反派是文革群众运动的左派或“促进派”，以四派为代表的温和造反派是文革群众运动的右派甚至是文革前旧势力的复辟派？在四派看来，团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乱冲乱杀”，表明了他们团结不了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他们只能夺权而不能掌好权，亦即他们“只能打江山而不能坐江山”。在团派看来，四派借用并倚重文革前的干部力量，就大有可能使文革走向歧路直至不归之路，就大有可能消解文革直至否定文革。对于团派，四派强调，“既不能让右派翻天，也不能让左派翻船！”对于四派，团派强调，就是要同怀疑、批评、动摇和否定文革的种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清华文革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分歧和论战与其说是怎样进行文革，不如说是直接关系到文革权力的分配、权威的支配等等关键问题，直至关系到要不要文革，因为这种分歧和论战无法缓解，不可调和。两派都大加利用了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以及文革理论的纰漏、破绽和弊端，特别是充分利用了毛泽东及其文革的矛盾、谬误和异化。上述的分歧和论战在整个文革都具有代表性、深切性和普遍性。

清华文革群众两派的分歧和论战必然走向武力斗争和暴力冲突，这既是文革群众运动的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文革群众组织的取向所促成的。显然，“文攻”和“武卫”是文革群众斗争的政治硬币的两面。清华两派的暴力冲突自始就潜在地具备了。1967年底至1968年初，两派小规模武斗时有发生。武斗爆发的一个“引子”就是四派初步选定清华若干位原中层干部，并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

<sup>1</sup>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1967年3月30日，第5期。

谏言：“革命小将”即团派人员不宜担任未来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应考虑八至十名的清华原党委成员干部进入这一革委会。<sup>1</sup> 而团派决不允许清华原有的干部势力来执掌清华文革的大权，从团派在同一时期所进行的武斗以及对清华若干位原中层干部的迫害就可得以证明。两派由“文攻”走向“武卫”，这本身表明两派的斗争是不可妥协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表明文革群众斗争是自我否定甚至是自取灭亡的。

今天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清华大学 1968 年春夏之际的大武斗能不能避免和如何避免？“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于清华文革两派的“文攻武卫”迟迟不能甚至不可能给以裁定或制止，毛泽东更希望类似的文革群众两派进行“大联合”，而团派和四派的生死之争已使毛泽东的愿望脱离了文革群众斗争的实际。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派各自的“鸽派”势力日趋衰弱，各自的“鹰派”则不遗余力地坚持武斗，甚至不惜以更大的冲突和牺牲为代价把武斗进行到底。尽管在 1968 年 4 月 23 日至 7 月 27 日的“百日大武斗”之前和期间，团派占有更大的主动、负有更大的罪责，但是团派只有经过武斗才能打破它与四派相持不下的僵局，也才有可能争取一个它所希望的武斗结局；同时，四派只有与团派誓死拼争，它才能显示出它自己的价值、地位、意义和影响，也只有抱着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心态，才有可能打出一个团派意想不到的天地或出路。因此，对于两派而言，不是要不要武斗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武斗和如何争取武斗胜利的问题。

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既是整个文革时期单位或部门武斗的一个典型，也是整个北京地区最为严重和最为惨烈的武斗。首先，这种大武斗是其肇始者团派及蒯大富最大的政治败笔，它直接决定了团派及蒯本人的政治衰亡；其次，这种大武斗不仅仅限于清华校园，还在北京一些重要公共场所有所延伸或继续；再则，这种大武斗集中体现了北京地区文革的一大特色即大学生造反派之争的凸显和深重；另外，这种大武斗在 1968 年 5 月 30 日达到高潮之后，就基本上趋于两派都无力回天的僵局，终止大武斗已不是两派力所能及的事；最后，终止这种大武斗的也不可能是清华名义上的上级主管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而是唯有毛泽东本人。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1968 年 7 月中、下旬数次在北大、清华周围等地组织要求停止武斗的群众游行，四派看到这一点，数次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建议对清华实行军管或直接派出群众队伍进入清华，平息武斗。四派最后

---

<sup>1</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文革三，案卷号：015，首都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 414 简报组编《情况简报》第 12 期（1968 年 2 月 28 日）记载：1968 年 2 月 23 日，414 总部向有关部门正式提交了《关于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意见》。必须指出的是，1967 年底至 1968 年 8 月初，团派总部和四派总部都各自不定期地、分别地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近二十位成员提交有关清华文革的“情况简报”。两派简报尽管各执一词，但却具有相当大的清华文革史料价值。

一次提出此类具体建议的时间是7月26日即“七二七事件”的前一天！<sup>1</sup> 尽管我们今天受到当时有关档案文献资料还没有开放的限制，无法考证四派的这一建议是否送达到毛泽东那里或是否为他所得知，具体地说，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决定是否有联系或者有何联系，但是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多多少少有些“不谋而合”。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7月27日团派抵抗他所派出的数万工人进驻清华而造成的严重牺牲，他的直接反应是：“造反派，真的反了？！”<sup>2</sup> 然而，正是他的这一派出决定及其实施，证明了“百日大武斗”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团派不“败”而“败”，四派不“胜”而“胜”。团派的“败”则败在了毛泽东的不满、干预和扭转，败在了团派对进驻清华的工人群众的武力抵抗；四派的“胜”则胜在了它彻底拖垮了团派，胜在了它与团派殊途同归而一起进入了清华文革历史的博物馆。

由“七二七事件”而来的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凌晨3时半至上午8时半许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sup>3</sup> 不仅给清华文革最初两年的历史划上了一个休止符，而且也给文革初期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打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毛泽东以这一事件为契机，不仅使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走入了文革的历史坟场，而且结束了以群众运动为主体的文革初期历史而使文革转入逐渐恢复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新时期。“七二七事件”和毛泽东“七二八召见谈话”注定了团派和四派被彻底逐出文革政治轮盘赌的大局。<sup>4</sup>

清华文革群众组织，确切地说，四派给文革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四一四思潮”。“四一四思潮”的形成和传播主要而又集中地体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该文作者周泉纁1967年7月间所写的这份同名大字报，来源于井冈山兵团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最初经过四派个别人士对于河南省文革形势的评议和“指导”，最早体现于周泉纁同河南有关人士的通信以及周本人同河南有关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纪要，最终得到几位四派人士特别是几位原清华干部、教师的修改和充实，形成为较为系统的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既有四派大多数人认可或奉行的观点，又有周泉纁等加以条理化或有所发挥

---

<sup>1</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文革三，案卷号：014，《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简报》。该简报汇编记载：1968年7月26日，414简报组给“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汇报与建议”：“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可否由谢副总理带头，组织北京工人、农民、解放军、中学生、大学生，连续一个星期每天以几万人的队伍，轮流到清华、北大这样武斗最厉害的地方、封锁最严的据点周围游行示威，宣传七三布告，创造和平气氛，并在此基础上再采取解决措施，拆除工事，上交武器和全部停止武斗的问题。”

<sup>2</sup> 1968年7月28日凌晨2点半左右在接到周恩来报告清华大学“七二七事件”所发生的流血牺牲的电话后，毛泽东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共和国历程》中卷第1133页（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sup>3</sup> “五大领袖”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

<sup>4</sup> 参见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重新解读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第439-463页，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

的独特见解。作为在文革初期两年里非常有代表性的思潮，“四一四思潮”具有较为丰富、深切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取向，成为清华文革历史乃至整个文革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因为，不同于文革初期出现的诸多思潮大都为极“左”的或极端激进的思潮，“四一四思潮”是唯一一个以文革前的中共意识形态主流为依据的“右倾”思潮。这种思潮能在清华大学出现和传播，恰恰说明了文革前“十七年”“党化教育”的直接作用和切实影响。从“四一四思潮”的源起、流变和结果来看，文革（更不用说清华文革了）的确是一场中共“十七年”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与毛泽东意义上的文革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之间进行的角逐或博弈。

“四一四思潮”的基本内容大致如下：一是文革中与文革前十七年相比，“阶级阵线和阶级关系不变”；二是“造反派只能打江山而不能坐江山”；三是文革自身应进行修补、整顿，“河归旧道‘十七年’”；<sup>1</sup>四是文革既要反右，更应防“左”。

“四一四思潮”从总体上讲是文革初期相对温和、保守或“右倾”的群众派别对于整个文革的一种心理上的“拨乱反正”，也是对于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及其实践的一种精神上的“矫正修订”。“四一四思潮”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削弱了毛泽东的文革策略。所以，毛泽东在“七二八召见活动”中对这一思潮的“钦定”斥责，反而凸显出这一思潮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魅力。

正如万润南当年对刘少奇家人所言的，刘少奇一案用不了二十年就得平反。<sup>2</sup>与此不约而同的是，团派在痛批“四一四思潮”的有关文章中也说，这种思潮“将和以后三十年或四十年刘少奇翻案的斗争汇在一起，因为这种思潮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sup>3</sup>职是之故，“四一四思潮”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文革之后取得历史性胜利或成功的文革思潮！

#### 四、“工宣队”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向清华大学派出的三万多工人来自北京六十一个企业、事业单位，不仅没有任何一个清华人事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派出，而且这三万多工人到达清华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泽东要平息清华武斗的决定。当时，仅有工宣队极少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知道这一决定。在其开始之际，工宣队的名称也由最初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变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到“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到1970年后工宣队人数不足百人）。如同在红卫兵、工作组等问题上所做出的那种按照

<sup>1</sup> 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365页，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版。

<sup>2</sup> 万润南：《商海云帆——四通故事》，第209页，天语出版社，2013年版。

<sup>3</sup>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编：《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简报》，1967年底翻印团派内部传阅的《干部问题》一文。

湖南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的制约，毛泽东对工宣队职能的调整和确定也是根据文革当时形势而适时地做出的。由于团派武力抵抗工宣队而造成了流血牺牲，更主要的是由于必须及时遏制文革群众运动和制止全国性的造反派武斗，毛泽东把工宣队作为结束大学文革造反派群众运动的“马前卒”。工宣队的职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发表的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所写并由毛泽东确定的题目《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确。

非常有意思的是，工宣队与前述的工作组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二者都来自清华之外的文革领导的“垂降”，给清华文革带来了“主宰”；不同的是工作组是文革伊始来到清华，它所沿袭的是文革前的中共政治领导及政治运动路线；而工宣队是在文革破裂或危机之际，它所实施的不只是扭转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趋势或走向，还要进行文革意义上的“教育革命”。工宣队不同于1967年至1969年间在文革中广泛流行的处理或解决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所采取的军宣队方式或军管方式。虽然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有一定的工人成份，但是其领导或主干却是来自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干部。这种打着工宣队的旗号来对清华文革实施军人干预和军人领导的做法乃是文革的一个独创。由此可问，毛泽东为什么不以军宣队或军管的方式介入或解决清华文革两派群众的斗争及其危机？因为，利用工宣队的方式要优越于军宣队方式或军管方式。工宣队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优点”：一是工宣队中的工人人多势众，给清华大学这样一个拥有数万人的单位很难派驻数百人或数千人之多的军人队伍来进行“管治”；二是派驻工宣队，至少名义上“工人阶级的地位”高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以理论上的强词夺理在清华全校各个部门或环节实施名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三是军事化的管理或军事化的生活在清华大学难以全盘铺开，而工宣队则可立竿见影地让清华文革摆脱一时的危机，以迅速结束武斗的结果使得清华文革转入新的阶段；四是首先在清华大学尔后在北京五十余所大专院校进驻工宣队，要比全部进驻军宣队更为“有理、有利、有力、有节”，在京畿地区不宜出现过多过杂的军宣队或被军管的大学单位；五是工宣队确立了毛泽东及其亲信对于清华文革的直接钳制，清华文革1968年夏秋之后进一步成为毛泽东麾下独一无二的“文革要塞”。后来，清华校内外流行的那种说法即清华文革是“毛主席的一个点”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工宣队在本质上是非清华的，完全来自于文革最高领导者个人的政治驾驭及政策运作。工宣队是清华文革后期八年（1968年8月至1976年10月）的政治“总督”，譬如，工宣队在清华大学所实施的“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的运作机制以及发布文件的范式，亦即工宣队高于党委会和革委会，就是清华文革不同于全国其他领域或单位的文革运作的一个特例。

一方面，工宣队给清华大学的教育体制带来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清华当时的主导力量既不是党委的政治领导，更不是革命委员会的业务领导，而是工宣队的全盘领导，表面上形成的是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三位一体、一体同构的局面，但实际上工宣队的领导及其权威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最高领袖。

针对工宣队一些成员不安心在清华工作，想回到原单位工作，工宣队举行学习班，安定军心，有人谈体会：“我们撤了，敌人就来了。”<sup>1</sup> 仿佛在他们眼里，清华大学就是一块以广大教职员为主的“敌区”。清华领导人在1974年的总结中强调，他们顶住了排斥工人阶级领导的“歪风”，“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中工人干部占二分之一以上。”<sup>2</sup> 这是信口雌黄，因为在清华校一级的领导班子，工人干部的比例就远不到二分之一。1968年后的清华各级领导班子甚至整个大学的领导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队代表（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干部，真正的工人微乎其微）、老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革命教师”的代表席位不是没有，就是无足轻重。工宣队凌驾于革委会和党委会之上。1969年初成立的革委会只不过是处理日常行政和教学事务的机构，1970年成立的党委会不过是“抓大事”即抓阶级斗争、抓教职员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门。在清华之外，还几乎没有与之相似或相同的工宣队的权威。在恢复了清华的中共党的机构和领导之后，工宣队依然叠床架屋地行使着大权，这势必造成清华党组织中“党内有党”直至“党外有党”的局面，最主要的就是来自工宣队的干部与原有的学校干部的区分。

工宣队进驻学校，有多重的意义和功能。从当时来看，是为了恢复学校秩序，稳定学校局势，消除群众武斗，整合不同群众势力，力图把文革转移到与以往不同的有序阶段；从长远来看，是为了取得学校的领导权力，整治广大教师，不相信学校原有的干部，监督和改造学校的各种人员，试图以崭新的“教育革命”更换整个教育事业，并为塑造文革的新人、新社会提供一个基地。

其二，清华文革此时的教育体制出现了以工人（实为工宣队人员）、学员、教师构成的“三结合”组织体制。这里，无疑，工人是领导，学员是主体，教师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对象。

工宣队把过去的“大学生”或“本科生”的称呼、称谓统统改为“工农兵学员”（简称学员），以示与过去的大学生（文革中被称为“旧大学生”）乃至整个过去的教育体制和传统区别开来，用文革的术语来说就是“决裂”。学员的取向和内涵是大学生等所无法企及的。从对学员的培养和经历来看，工宣队是要把他们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业务标准放在首位。

---

<sup>1</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30，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内部参考》，1969年10月18日，第61期。

<sup>2</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工宣队一个别出心裁的作法就是制造教师与学员的隔阂甚至对立，抬高并夸大学员的地位和作用，把作为受教育者的学员视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即受教育者要帮助教师改造世界观，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sup>1</sup> 1970年春，试招的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后来改成清华大学直至全国性的工农兵学员要奉行的宗旨：“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一“上、管、改”的口号逐渐演变为文革时期大学的学员政治活动机制，主要用来在学员与教师之间划定一种明确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界线。学员们在入学之际和入学之后，都一再被告诫不是简单地上大学，而是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们争夺教育权，并要占领教育阵地。“工农兵上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掌握文权、巩固政权。”<sup>2</sup> 因而，“对待工农兵学员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sup>3</sup>

其三，工宣队在全国率先提出“砸烂教研室（组）”，指责教研室（组）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它从组织上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分离、教员与学生分离、各门课程彼此之间分离。”<sup>4</sup> 具体作法就是解散基础课教研室（组），把教师编入学员班。教师的工作置于学员的班级之中，教员的一切教学计划、教学任务和政治活动由学员班级党支部来讨论、决定。作为中国大学体制的基层单位，教研室（组）的设立引自苏联，清华此时取消教研室（组）的作法，已不是简单地否定苏联经验的问题，而是取消教研室（组）的知识分子构成和业务性质，实施和体现工宣队领导下的新体制所具有的“改造并分化知识分子”的功能。

另一方面，工宣队在清华大学的所作所为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不断进行“清查、清理运动”，二是整治广大教师和部分清华原干部，三是大搞“教育革命”。

工宣队从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它是以持续不断的清查和迫害来维系它在清华大学的统治。1968年底至1970年清华大学被迫自杀的人数急剧增多，已逾20多人，就说明了这种清查和迫害的残酷和惨烈。工宣队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从狭义上来说就是一部整治、迫害清华众多教师和干部的历史。他们通过大大小小十余次不止的政治运动给清华教师和干部套上了一层又一层无形的或有形的政治枷锁。工宣队一位负责人就道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心声”：“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那么什么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这一段话在发表时被改为：“广大知识分

---

<sup>1</sup> 同上。

<sup>2</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8，《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sup>3</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4021，《东北地区我校首届工农兵毕业生调查》。

<sup>4</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子……什么时候思想平静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检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头路。”<sup>1</sup> 更有甚者，工宣队还把广大教职员工下放“改造”，加以惩治。1969年5月，清华大学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外鲤鱼洲建立了“试验农场”。这一农场位于鄱阳湖畔，占地约1.1万亩。工宣队把这个还没有建成的农场吹嘘为“既是一个抗大式的劳动大学式的学校，又是一个既有工业，又有农业、商业，又有科学试验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里将成为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主要基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同时，在这里也改造那些犯了错误的人。”<sup>2</sup> 同年5月至10月，清华先后有五批约2821名教职员工（约占清华当时教职工总人数的70%）先后来到这里劳动改造。这个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由于从事水中劳动和防洪等，先后有上千名的清华教职员工患上血吸虫病。

工宣队把清华广大教师当成文革的主要对象之一。经过1971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潜在敌的做法得到了某种“证据”。这著名的“两个估计”是指：一、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所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二、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sup>3</sup>

1970年秋季之后，许多清华教师愈益感受到“两个估计”如同两座政治大山压迫着自己，大为不满。这种对于教师所采取的可用而不可信的政策，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加敌视，特别是对于那些1949年之后到1966年之前学成而就业的教师来说，不啻是巨大的失落甚至沦丧。他们一些人针对上述纪要，提出了批评。一时间，关于如何看待“两个估计”，成为清华斗争的焦点之一。工宣队一再强调，“否定两个估计，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sup>4</sup> 他们引用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为根据：“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胜利呢？”<sup>5</sup> 这也就再次表明，文革把阶级的以及阶层的划分标准从过去的经济地位、家庭出身改变为现今的职业、知识直至世界观，这不能不说是文革阶级划分法的一个独创；进而，由世界观问题来把知识分子当成文革的“另类”或“异己”，这也就使得文革由风雨如磐的“政治革命”必然伴随着某种剜心剔骨式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革

<sup>1</sup> 清华大学《清华战报》编辑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载《清华战报》1973年11月8日，第77期。

<sup>2</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2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简报〉1969年5月31日第179期》。

<sup>3</sup>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542—545页，北京，国防大学，1988年版。

<sup>4</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sup>5</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9，《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材料》。

命”。

工宣队自 1969 年初以来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受到了许多清华原有的干部和教师的斥责，他们借着 1972 年周恩来关于教育整顿的指示精神，试图恢复过去某些合理的教学做法和实行某些改革的工作措施，遭到了打击和迫害。1973 年 10 月至 12 月，清华上上下下开展了一场“三个月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整治被称为体现着“旧教育路线回潮”的一大批清华干部和教师，有 64 人受到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403 人被点名批判，被点名指责的或被迫作检查交代的人难以计数。<sup>1</sup> 正如清华当时的材料所总结的，这种代表人物实质上“就是进入一个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改造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sup>2</sup> 今天，把在“三个月运动”中受到审查和批判的上述清华干部和教师的言论汇集起来看，无非是他们主要集中在下列十多个方面表现出的不满和指责：文革教育政策，文革种种行径，祸国殃民的极“左”作法，大学状况，知识分子的待遇和遭遇，江青、王洪文和张铁生等人的言行，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及政治迫害，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外交政策的转变，毛泽东本人的矛盾等等。<sup>3</sup> 这些不满和指责在当时无疑是深切和尖锐的，但更重要的是表明，即使在“教育革命”的兴盛时期，清华大学都有一股根深蒂固的批评、怀疑和动摇文革的心态在潜行。

工宣队与“教育革命”可喻为形影相随。质言之，工宣队有没有给清华大学带来教育建设、科学发展、学科创新和学术进步？历史的回答只能是：否！

毋庸置疑，进驻清华的工宣队在文革时期的所有工宣队中充当着执牛耳或领头羊的角色。这不仅是由于这支工宣队直接来自于毛泽东的授命，而且它是整个文革的后八年时期大学领域的“政治风向标”。这支工宣队的成员，他们的平均学历不高，大致上不超过初中水平，绝大多数成员过去根本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他们在大学教育业务上不可能与清华的教师和干部同日而语。他们被套上了由毛主席派到大学天地的政治光环，也就真正开创了文革时期大学领域“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冲击业务”的局面。“工宣队模式”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教育主张和教育政策的集中折射和反映。毛泽东由其早年的民粹主义理念和反智主义情怀嬗变为文革时期乌托邦主义的“教育革命”，这是清华大学的不幸，更是中国教育的不幸！

## 五、“教育革命”

<sup>1</sup>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 284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sup>2</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临核查，案卷号：022，《整党办公室核查组“文革”中大事件调查报告 1、关于“三个月运动”，2、“三个月运动”中被迫害同志的材料》。

<sup>3</sup> 同上。

清华文革“教育革命”真正开始的时间是在1969年初。显然，文革头两年的群众运动的论战和武斗无法使“教育革命”铺排开来，当文革群众两派围绕着权力斗争进行着生死较量之际，谁来具体实施“教育革命”还无从谈起。工宣队进驻清华，为“教育革命”的全盘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领导保障。

首先，“教育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政治建校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灵魂，是解决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sup>1</sup>“在一定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就是占领广大知识分子的群众。”<sup>2</sup>

1970年7月22日，清华工宣队发表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以下简称《创办》），概述了清华“教育革命”的主要经验。这份经过姚文元等人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文章可称得上“教育革命”的“范文”。以《创办》为标志，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方案首次以比较系统、权威的形式出现，它是后来被称之为“教育革命的‘圣经’”<sup>3</sup>的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某种“雏形”。它所总结的清华“教育革命”的六个内容分别为：一、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二、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四、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五、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六、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在清华连续四年没有招生并中断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创办》却“理论先行”，为文革的大学办学画出了“蓝图”。《创办》一文对于文革时期的大学办学具有指导意义，标志着文革“教育革命”体制的初步形成，成为文革时期全国通行的大学教育大纲。

“教育革命”在清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偏执和独断。清华领导人多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今后，检查一个办学点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看这几条：工农兵管教育管得怎么样？教师、学生与工农兵结合做得怎么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上好阶级斗争主课做得怎么样？”<sup>4</sup>“教育革命”的目的，就如同清华文革写作班子“秦怀文”撰文所说的：“我们的专业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首先要上的是阶级斗争的专业”。<sup>5</sup>迟群典型地概括为：“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

---

<sup>1</sup> 同上。

<sup>2</sup> 同上。

<sup>3</sup>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5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sup>4</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sup>5</sup> 秦怀文：《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大学教育》，北京：《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2期。

士。”<sup>1</sup> 他曾强调说，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其次，“教育革命”是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的革命，具体地表现在招生、师资、办学方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方面所进行的“革命”上。

“教育革命”把改变以往“智育第一”的招生方式、改变工农子弟比例不高的学生成分当作一项基本的内容。随着“教育革命”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如何办学及怎样招生的问题就摆在了大学的面前。1969年3月至8月，清华大学通过在校内外举办数十个教育革命试验班和200多次讨论会，听取对大学招生等问题的意见，提出了实行“教育革命”的一些初步设想，最主要的就是招生对象和招生办法，确定了：“一、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招生对象，是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其他革命分子。……二、招生和分配要适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三、关于文化程度。……今后大学从工人中招生，文化程度不宜限制……。四、学生年龄以20—35岁为宜。五、招生办法。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招生考试制度，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群众路线，……推荐与选拔相结合。”<sup>2</sup> 到1969年夏天，清华“教育革命”的招生方案实际上已经形成，同年底，这套方案的试点经验已经定型，一年后推向全国。

1970年3月，北大、清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就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招生时间和名额、学生条件、招生办法和地区、学生待遇、分配原则等八个方面作了规定，提出招生方式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制根据各个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一、二、三年，另有学制为几个月的短训班；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战备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sup>3</sup> 6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这一报告及其相关精神成为1970—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圭臬。

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最初为三年半，1975年改为三年。“三年半教学过程大体安排是：学员入学后，首先参加专业生产的全过程，同时参加工厂的技术革新，一面实践，一面学习基本知识；然后根据专业的不同情况，结合一个或几个典型的生产、科研任务，边实践边学习，同时紧密联系实际，安排一定的理论提高阶

<sup>1</sup> 转引自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23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sup>2</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26—6902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报〉1969年1月31日第146期、8月9日第193期、第194期》。

<sup>3</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000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招生（试点）、应届毕业生情况的请示报告等材料》。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7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段。”<sup>1</sup> 清华大学在 1972 年规定，切实保证学员在每学年 39 周中有 81% 的业务学习时间，<sup>2</sup> 保证教学总学时中 75% 到 80% 的时间用以业务学习，<sup>3</sup> 但是事实上只能保证 50% 左右，因为大部分学时还是被入学教育、政治报告、政治讨论、大批判会、排练演出、庆祝活动、野营拉练、挖防空洞、挖坑栽树、挖河清泥、清理仓库、迎接外宾、看内部电影等等所占用。<sup>4</sup> 又如，1975 年 5 月 5 日，按照清华革委会下发关于学员每周活动时间安排通知的精神，一周七天 21 个单元时间（每一单元约 4 个小时）中，至少有 5 个单元时间为非专业学习时间。<sup>5</sup> 由于教学总学时减少了 50%、教学内容减少了 40%，一些教师提出不满和批评，因而如何看待教学质量成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资产阶级还要在这个领域，利用他们某些文化的优势，反对无产阶级的占领。”<sup>6</sup> 在“政治第一”甚至“政治就是最大的业务”的支配下，学时得不到保障。

清华“教育革命”进行之际，师资力量只能是“接收”过去学成的、现今在职的教师，尽管无法信任和无法依赖这些教师，但是这种“教育革命”根本没有自己的所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不可能撇开已有的师资力量而另起炉灶，现实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政治上不可信的教师去从业务上培训学员。因而，“教育革命”的师资政策十分矛盾而又荒唐可笑。1970 年招生后，即使教师们从事教学，也是动辄得咎，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具有教学的主导性和积极性。“教育革命”的斧钺不可能放松对于广大教师的威慑。工宣队经常使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对付教师们，并且有了“经验”之谈：“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发动了群众，就暴露了敌人；依靠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sup>7</sup>

“教育革命”一再给教师的重压使得一些新教师力图向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看齐，他们不想接受教师的身份和称号。例如，1970 年夏天，文革前招收的清华在校大学生全部毕业或结业，873 名毕业生留校工作，其中不到一半人从事教学和科研，其余的从事工厂、后勤、机关等工作。为了表示与旧教育的“决裂”和与工人阶级“划等号”，他们自称为“新工人”而放弃“教师”的称号。另外，在“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影响下，清华一些老教授试图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罪名改换成对“教育革命”的某种适应，工宣队对此概述为：

---

<sup>1</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sup>2</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2034，《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下发校内各单位文件（一）》。

<sup>3</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35，《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下发校内各单位文件（二）》。

<sup>4</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及有关人员在校内外会议上的讲话》。

<sup>5</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5023，《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会革委会下发文件》。

<sup>6</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sup>7</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8009，《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报〉1968 年 11 月 15 日第 88 期》。

他们从“业务名词不离口，到红宝书不离手；从故纸堆里钻出来，到大批判战场上杀上去；从‘神仙会’养尊处优，到‘学习班’斗私批修；从消极等待‘斗、批、休’，到积极投入斗、批、改。”<sup>1</sup> 这往往是这些教授的异化式的表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文革“教育革命”都是广大教师的心灵苦难史和精神炼狱史。

清华“教育革命”把教学同生产劳动的结合演变成为整治教师、冲击教学并使教育裂解而蜕化的“大棒”。这种办学必定是以牺牲或削弱理论教学（特别是基础理论教学）为代价的。这种办学在清华还对作为理论教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实验室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清华的实验设备普遍落后，大体上是1950年代的水平，甚至还有1930年代水平的实验设备。<sup>2</sup> 到1974年，全校58个实验室，除6个较好外都受到损害，有21个需要完全重建。清华科研人员也由文革前占教师人数的30%下降到10%。<sup>3</sup> 即使在文革结束之际，清华全校的实验室状况根本没有得到改善。

清华“教育革命”的办学方式不仅在于上述的以办厂来代替教学，还在于使学员走出教室和实验室，“开门办学”的方式不仅仅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而且首先是使学生向“工农思想开门”，<sup>4</sup> 从而保证学员学习的所谓政治质量、路线质量。清华“教育革命”一再强调，“开门办学”关系到学校培养“什么人？”和学生“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开门办学”的方式还表现在抛弃清华过去通行的“老三段”教学程序即“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实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提出“教师启发做向导，书本理论做参考，生产实践是基础，课堂总结再提高”。<sup>5</sup> 这无疑是把生产劳动看作先于教学并且高于教学。1974年初，为了回击去年所谓“旧教育路线回潮”，工宣队决定，清华在校的几届学生全部走出校门，进行“开门办学”。同年初春进校的新学员，刚入学就让他们出去“开门办学”一年，致使他们上业务课的时间大大缩短，只占总学时数的45%，有的专业只占20%。同年批林批孔运动大规模开展之后，“开门办学”的方式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强化。

与此同时，“开门办学”的教学必然要打破和清除清华过去教学中的“三中心”论，即“教师中心——课堂中心——课本中心”，带来了一种名为教学为生产劳动服务、实为以“教育革命”的政治为中心的相当混乱、破绽百出的教学秩序。例如，基础课教学原是全校统一负责，改为基础课下放到每一系甚至每一个班，即每一系都有几乎“门类齐全”的数学、物理、政治课以及有关基础课的教

<sup>1</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2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简报〉1969年5月31日第179期》。

<sup>2</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2024，《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加强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

<sup>3</sup>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第276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sup>4</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4024，《迟群、张风瑞等在华北五省及北京市有关会议上的讲话》。

<sup>5</sup> 同上。



师。教师们被分散、被编入到不同的学员班级，同一学员班级由学科不同的教师混合组成“业务组”，如同火车的“包乘组”，把学员由入校带到毕业。1970年之后，清华逐渐恢复了部分教研组，但在1973年底之后，又把教师与学生按照专业合在一起，建立党政合一的工宣队队员、教师、学生三结合的专业领导小组。在教学上由几个教师负责一个班，承担由基础课到专业课的全部教学任务，甚至原有的系一级的基础课教师也被“下放”到各个班级，在教学上实行“三自一包”即自己编写讲义、自己刻印讲义、自己讲授讲义，各门课程包干负责，教师的教学“单干”现象严重，教师忙得无所适从。还有一些教师所学非所教或者所教非所学，例如，原有的一大批基础课教学（例如，电工学、热力学、工业电子学、画法几何、工程画图、机械零件等）是为全校开设的，但这时却集中在某些系或教研室甚至班级里，其他单位要开设这些课程就得另找教员，改行开课。教学秩序和教学局面的混乱引起了许多学员和教师的不满，他们认为，必须改变这种把基础课教师分配到连队（即系、班级）的“连队所有制”作法。<sup>1</sup> 这种作法如同从协作明确、效率优先的工业经济蜕化成包田到户、力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清华“教育革命”也在教学方法上做出了与上述方面相适应的变革。按照《创办》所说的，“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学边干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这又是谎言，因为在《创办》写作的1970年初，清华大学还没有正式招收工农兵学员，只不过是招收了几类不同的为时几个月到近一年的短训班进修学生，拿这种培养短训班的经验来侈谈什么大学本科的教学，与其说是以偏概全，不如说是以观念的强制先行来杜撰后来的教学模式。因而，这就不难理解“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sup>2</sup>，亦即往往把基础课同专业课混为一谈并且彼此受害。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使教师无所适从或难于适应，而且使学员所学到的东西或是非系统的甚至非理论的经验之谈，或是急功近利、穷于应付的手工技艺。

清华“教育革命”所倡导的教学方式还有教师、学员、工人（有时为工宣队队员）三方一起进行的“三结合备课方式”，这一般是由教师先写出教学规划，由学员班级支部或代表讨论、由工人“把关”后方可由教师实施的教学活动。然而，实际上，这种教学完全是以教师被动、学员任意改动和工人随意决定的形式来进行，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学质量的改进和提高。即使是清华“教育革命”的一

---

<sup>1</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sup>2</sup>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载《人民日报》1970年7月22日。

份经验材料中也批评了有些学员上课时对教师一不满意就当场批判教师，“使一些教师感到压力很大，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有的甚至不愿意在教学第一线工作，认为谁上讲台谁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谁在台下谁就当革命的动力。”<sup>1</sup> 在“教育革命”的年月里，清华还多次发生过教师按照大学的水平讲课，却因学历低、知识浅的学员听不懂，教师被轰下讲台的事情。例如，1940年代担任过清华大学理工学院代院长的一级教授陶葆楷就曾在讲课中，因为学员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而听不懂，当场受到斥责和批判。<sup>2</sup>

清华“教育革命”把编写与过去不同的教材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不同不是从教材的学理方面而是由教材的政治价值来确定的。因此，“各门课程都要贯穿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要发动群众，到工农兵中去，开门编教材。”<sup>3</sup> 这种在教材编写上的“革命”就是推翻和抛弃文革前所用的一切教材，要按照“开门办学”等“教育革命”的方式来编写新教材。对于许多课程，新教材不是在讲课的前夕才发出的“传单式的”东西，就是在课堂上可以任意放弃、随时改换的“玩物”。更为荒唐的是，这种新教材的编写大都是由教师写出初稿而由学员和工宣队队员“审定”的政治性教学任务，仿佛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编写教材的过程也就是政治建人的过程。”<sup>4</sup>

再则，清华“教育革命”乃至整个文革“教育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教育的仇视和对于教育者的鄙视，如同当时清华一位领导人所说的：“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卫兵（学生）的夺权是一事无成的。……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sup>5</sup> 同理，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清华“教育革命”的众多事实说明，如何对待“教育革命”意味着如何对待文革，反之，亦然。因而，“教育革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成败，反之，亦然。但是，“教育革命”是必然要失败的，其原因有三：

第一，“教育革命”是一场蒙昧而荒唐的“革命”。它是文革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为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sup>6</sup> “教育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这种实质大致归结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教

---

<sup>1</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8，《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sup>2</sup> 同上。

<sup>3</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sup>4</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30，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内部参考》1969年11月27日第75期。

<sup>5</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及有关人员在校内外会议上的讲话》。

<sup>6</sup>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第8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育平均主义等等，<sup>1</sup> 而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只是“教育革命”的特性，并不能涵盖其实质。“教育革命”的实质是蒙昧主义。因为，“教育革命”带来的是窒息精神，禁锢思想，扼杀教育，破坏教学，从而毁坏人才建设，阻碍文明发展。“教育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教育的大倒退，甚至是一场文明的大反动。下面仅用清华“教育革命”的事例来说明。

1972年9—10月，清华校级领导人先后分头到各个系进行调查研究。一是发现学员的文化知识程度和年龄严重不齐；二是发现学员的学习水平实在差强人意；三是发现学员中具有难于想象的学习困难和无法克服的学习障碍；四是发现基础课往往冲掉了专业课，课程学习中没有循序渐进，几乎没有严格可行的标准。<sup>2</sup> 清华当时的校方总结材料中也承认，在教学中遇到了学员文化程度严重不齐的尖锐矛盾，学员最高的程度达到了中专水平，学过微积分，而低的连加减乘除运算都很困难。<sup>3</sup> 更为可笑的是，有的学员不仅基本概念不清，而且就没有基本概念，一位学员就认为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为此还与教师争论了半天。<sup>4</sup> 有的学员甚至连书信也写不了。更为荒唐的是，由于学员的学历水平参差不齐，同一个专业班级的学员往往迫不得已被分开来上课，即在同一个上课时间，有的学员补习中、小学的知识，而有的学员在学习大学的知识。

整个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出国人数总共为12人次，其中只有一人赴法国短期进修，其余都是短暂访问。清华大学在这10年里没有向国外派出留学生，与世界先进的大学教育的交流几乎无从谈起。

文革给清华大学在内的全国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工作留下了12年之久的空白。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教学和教育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非常中肯的定位。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召开三十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参加的座谈会上，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谈到该校有的工农兵学员只有小学程度，只好在大学补习中学课程半年一年，接着就“坐飞机”读大学，三年就毕业了。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应当称为清华中学、清华小学。<sup>5</sup> “教育革命”使得清华大学蜕变为清华中学或清华小学，这是“教育革命”的蜕化“奇迹”，还是“教育革命”的蒙昧标记？

---

<sup>1</sup> 参见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sup>2</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2021，《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会对各系学员教学质量的调查报告》。

<sup>3</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8，《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sup>4</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sup>5</sup> 转引自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第339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教育革命”是反动而可耻的“革命”。“教育革命”取消文化考试标准而采取以政治标准招收学员的作法，从最初“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很快在相当大的范围演变为仅仅由单位或部门少数领导人具有决定“保送上大学”的权力实施，实为“走后门”。据当年清华有关领导到有关的系、班级调查，发现在不同系、班级学员总人数中“走后门”的学员比例约占12%，个别班级高达约20%左右。这种“走后门”现象也是全国性的。“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炫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畸形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sup>1</sup>因而，“教育革命”的一个先天性的、似乎不可治愈的弊端就是它固有的封建特权的文化“基因”及其思想“遗传”。由此，“教育革命”是由蒙昧走向启蒙、近代走向现代，还是大反其道而行之，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第三，“教育革命”是一场教育乌托邦的实践。清华大学1975年制定的“教育革命”长远规划初稿中提出在未来几年里，把清华大学初步建成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现代化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提出逐步实现教育经费自给以及粮食、副食自给，“不要国家一分钱”；办学方式有：普通班、短训班、业余大学、分校教育、函授及电视教育；争取每年通过短训班及业余大学培养五万名学员；加强普通班的改革，普通班要认真落实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行半工半读，积极进行专业改革；力求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改变重尖端轻一般、重理论轻实际、重设计轻工艺等现象，改变各种专业之间分等级的作法，不断缩小和取消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和取消专业分散的现象，既面向工业，也要为农业服务；培养清华内的工人，使他们半工半读，在若干年内达到或接近大学水平；要扩大教师的工农成分，力争在1985年使工农成分的教师占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使30%左右的教师既能讲政治课又能讲业务课，同时使教师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学员一起学工、学农、学军，实行半工半读，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个教师在五年内应累计有一年以上的劳动时间，“基本掌握本专业的实践操作，能在一个工种顶班劳动。”<sup>2</sup>

更有甚者，差不多与此同时，清华有关写作班子在论及在教育阵地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些文章中，把“教育革命”当成实现社会革命的重要手段，提出“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就应当成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以致最后消灭三大差别，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重要手段”；强调“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不只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是对旧教育的否定，同时还是改造整个社会的手段”；因而，结论就是“教育单位同生产单位的分离，是随着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阶级对立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也将随着脑体

<sup>1</sup>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9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sup>2</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分工和阶级对立的消灭而消灭”，“至于大学消亡的问题，到了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完全做到了‘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独立于生产单位之外的教育单位——大学，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但那是将来的事”，尽管现今大学还是要办的。<sup>1</sup>

“教育革命”是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实施和破产。它致使教育沉沦为文革的附庸，致使大学沦陷为文革的屠场，全盘地钝化甚至瓦解大学教育应有的取向和职责，竭力地阻滞人才的成长、思想的探索和学术的创造，从“教育革命”理论的先天缺陷和谬误到其实践的后天变态和丑陋，等等，无不表明“教育革命”及其方方面面充满着无法解决的异化和无法克服的自身异化。因此，“教育革命”本身就是反教育的。

## 六、从“教育革命大辩论”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从1970年起，清华工宣队的两个人物迅速崛起。作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的“钦定亲兵”，迟群（原中共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毛泽东的速记员、机要员）不仅对清华文革而且对整个文革都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例如，他们对1974年年初“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带来了直接的作用；<sup>2</sup>又如，谢静宜还参加了审查林彪事件及林立衡本人的工作；<sup>3</sup>另外，他们直接领导并具体指导着毛泽东文革晚期的写作班子即“梁效”大批判组。<sup>4</sup>

特别是迟群本人，给文革带来了两个独特的“贡献”：一是1968年春夏，毛泽东派出其身旁的警卫部队干部进驻北京的“六厂二校”，<sup>5</sup>直接指导这些单位的“斗、批、改”，以便把它们的工作经验推向全国。作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迟群执笔撰写的新华社内部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好评，认为是“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批发全国。<sup>6</sup>以此稿为标志，各地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迟群本人还在清华向来自全国各地区、各单位难以计数的人们做过

<sup>1</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政，案卷号：050，《政治部 有关论因循守旧、翻开历史论教育、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以及进一步深入批邓中做好政治工作等意见》。

<sup>2</sup> 参见《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74年1月25日），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90—109页，北京，国防大学，1988年版。

<sup>3</sup> 参见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第14—16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

<sup>4</sup> 参见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第7页、第19页、第39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版。

<sup>5</sup> “六厂二校”是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木材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sup>6</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16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上百场介绍清华“斗、批、改”经验的报告。二是1971年春夏，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为4月15日至7月31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执笔撰写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经过张春桥、姚文元修订后，毛泽东8月13日审阅同意，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这个纪要的要害就是前面所述的“两个基本估计”。<sup>1</sup>

作为文革教育领域著名的“两个基本估计”的一大推手，迟群真正成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乃至教育领域的一大打手。迟群当时年富力强，很快超出了他当时的工宣队同事，继杨德中、张荣温（两人皆为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之后，于1972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工宣队第一把手。他切实执行并具体体现了毛泽东的文革教育路线和政策，成为毛泽东的清华大学“文革总管”。

谢静宜的最大政治资本在于她有着迟群等人所没有的直接可与毛泽东联系的优势。虽然谢本人的表达、组织和工作能力远不及迟群，但是迟群和工宣队要主宰清华大学，就必须有谢静宜这样一位可及时地传达并实施毛泽东旨意的通天人物。

这两位大概只有初中学历的军人，自1972年起对于清华文革的掌控，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毛泽东，所以他们当时被称之为“毛主席的两个兵”。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之后，谢静宜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作为清华第二号人物，谢静宜在清华校外的职位和权力，由于毛泽东的青睐和提携，很快超过了清华第一号人物迟群。1975年初，“四届人大”召开之后，迟群梦寐以求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愿望落空，迟、谢的关系开始紧张而微妙。迟从骨子里瞧不起谢，因为谢本人的工作能力及谋划水平很差，但是迟又离不开谢。二人的关系是政治上的若即若离或相互利用。有谢静宜充当自己的清华副手，迟群上可通达天庭，下可更有效地驾驭那些清华原有干部势力。然而，迟、谢在1975年初之后关系的紧张，既为清华原有干部所不齿，更为工宣队中不是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几位军队干部和工业干部所大加利用。

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sup>2</sup>两次写信给毛泽东的直接起因是清华工宣队原负责人之一柳一安（原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干部）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宣队工作回来之后，迟群没有给柳安排工作。柳开始发起并联系惠、吕二人，准备联名“上书”<sup>3</sup>毛泽东，反映迟群的问题。惠、吕二人充分意识到，写信给毛泽东本人，还必须有一个比他们“高一位”的清华主要负责干部来署名，

---

<sup>1</sup> 同上，第388页。

<sup>2</sup> 刘冰、惠宪钧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柳一安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吕方正时任清华大学政治部主任。

<sup>3</sup> “上书”一词带有封建色彩，故本文使用“写信”一词。

这样才更有力量。经过刘冰的同意，他们四人达成了写信给毛泽东的决定。他们四人写信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毛泽东派人来清华大学了解迟、谢问题，进而最终把迟、谢从清华“搬走”。<sup>1</sup> 他们四人清楚地意识到，不经过毛泽东的首肯或介入，他们乃至整个清华大学都无法解决迟、谢问题。然而，他们力争让毛泽东先派人来清华调查迟、谢问题的想法，是否会走向反面？看来，他们当时并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

刘冰等四人当时为了使他们的信件顺畅地送达毛泽东手中，他们通过让邓小平转交的方式。这就把邓小平本人牵连进来了。如果邓小平不同意或不重视刘冰等四人的信，他是不会转送此信的；如果邓小平同意或重视此信，那他一定会转送此信的。邓小平在刘冰等四人写信问题上的态度或立场直接关系到邓本人同毛泽东的关系，确切地说，就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文革之间的关系。

刘冰等四人 1975 年 8 月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只指责迟群一人，而毛泽东在了解此信后，把此信束之高阁。到了 10 月，刘冰等四人写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把迟群与谢静宜一起加以斥责。正是在 10 月之际，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对邓小平的批评，特别是对怀疑文革或否定文革的忧虑，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的两次来信做出了反应。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来信的口头“批示”，又一次引发了清华文革的“政治地震”。

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来信的指责矛头直指邓小平，而问题的焦点就在于肯定还是否定文革。坊间所传的毛泽东说：“迟群不能走，迟群一走不就是文革输了吗？”（大意）。毛泽东力挺迟、谢，这就再次表明毛泽东要把文革不可逆转地推行下去，他决不允许动摇、否定文革的政治倾向或政治势力在清华大学乃至中共中央上层乘机坐大。毛泽东决定从清华大学开始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从基层燃起批判邓小平的烈火，次年由于“四五”天安门事件，这种烈火蔓延成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写信的指责引发了文革最后一场运动从清华大学走向全国。

由上可见，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当时的领导人中威信很低。清华能有四位校级领导干部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的问题，这说明了什么？而在这四名干部中，刘冰并不是写信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只不过是排名在首，他同意并参与给毛泽东写信一事就表明他对迟、谢的极为不满。另三位干部则是“正统”意义上的工宣队干部（其中两位是解放军干部），他们三位对于迟、谢的“反抗”表明了清华工宣队作为毛泽东派驻清华大学的主导力量，根本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政治的拼斗和厮杀。通过刘冰等四人写信的事例，再次证明了清华工宣队的主干或主宰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毛泽东的文革“亲兵”。正是由此，1975

---

<sup>1</sup> 唐少杰 2005 年 10 月 19 日对惠宪钧的采访录；参见唐少杰：《我们写信告迟群》，《炎黄春秋》2008 年第 6 期。

年至 1976 年的清华文革更加牢固地、更加突出地被捆绑在毛泽东的文革战车上，并驶向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去世才有可能停止下来的不归之路。

1975 年 11 月 3 日下午 3 点，有 53 人出席的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在清华大学第二教学楼二层会议室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此会上说，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讨论刘冰等人两封信的问题实质。吴德并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批评。<sup>1</sup> 正是由于刘冰等四人不知道毛泽东对其写信的批评，他们在这个会议和稍后的会议上同迟群等人相互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斥责。刘冰本人是在 11 月 15 日晚列席政治局会议时才第一次听到了由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对他们写信的批评。<sup>2</sup> 毛泽东的上述批评第一次在清华大学全校公布是在 1975 年 11 月 18 日举行的万人有线广播大会上，由吴德作了传达。<sup>3</sup> 上述 11 月 3 日的会议“故意”不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味深长。从当时传达毛泽东批评的步骤来看，为了批判邓小平，试图通过刘冰等人的反应来决定有关部署。

毛泽东批评刘冰等四人写信所带来的作用和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清华大学一域一事，致使清华大学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处在了文革政治的风口浪尖。迟群、谢静宜与中共中央上层协力配合，把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即“批邓斗争”引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例如，1976 年 3 月 26 日，清华、北大十余人列席政治局会议，当面批斗、声讨邓小平本人，开创了中共历史上由基层组织人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面斗争中央领导人的先例。另据不完全统计，1975 年底至 1976 年春夏，全国各地、各单位约有三十多万人次来到清华从事“批邓运动”的“学习、取经”，还有十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和记者来清华观摩“批邓运动”及大字报。

自 1975 年 11 月起，迟、谢在文革最后的十一个月里，大力巩固他们在清华的地位，大力整合清华文革的干部队伍。他们几乎把清华大学“锻造”成了毛泽东文革的政治“桥头堡”。依照迟、谢的运作，清华大学成为整个文革天地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尖兵”。但是，有一点，他们决不会意料到，他们的政治生命随着毛泽东生命的死亡而很快死亡，在“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不到三个小时，迟、谢就束手就擒。如同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寿终正寝，迟、谢的政治死亡意味着清华文革步入黄泉。

迟、谢在清华文革的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他们通过不断地整治、迫害、肃清和恐怖而使清华大学众多干部、教师深陷厄运，甚至依此来提升他们的权力

---

<sup>1</sup> 2013 年底，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一书，在记述到毛泽东 1975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对刘冰等四人两次联名写信状告迟群、谢静宜的有关批评，写道：“11 月 3 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安排，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评。”参见该书第六卷第 621 页。这一记述明显有误。

<sup>2</sup>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第 243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sup>3</sup>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卷宗号：76016，《清华大学 1975 年 11 月 3 日至 1976 年 12 月 31 日大事记》。



和权威。迟、谢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毛泽东的文革在清华大学 1972 年至 1976 年的“化身”或“替身”，他们过分地甚至过于频繁地把清华文革引入全国文革的大局。这在很多情况下，超越了迟、谢本人文革政治角色的功能或负荷，致使他们以及清华文革难堪“重荷”，根本经不起清华大学之外更大的文革政治风浪的摆布或捉弄！

综观清华大学一百余年的历史，文革岁月是清华大学最为艰难、困苦、曲折和悲惨的时期。清华大学在文革时期共计有 58 人“非正常死亡”，1100 多人受伤（其中 30 多人终生残疾），1228 名教职员被“立案审查”（约占清华大学六千多教职员总数的 20%），178 人被打成“专政对象”（绝大多数属于冤假错案），经济损失无法估计。总之，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在整个文革时期具有为文革其他所有单位、部门和机构所没有的两个“亮点”：一是无出其右的文革群众特性，即清华大学的文革群众致使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富有独特的引导性、典型的个案性、深厚的思潮性和创新的实践性；二是独一无二的文革单位特性，即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致使清华大学的文革群众开创出从领袖到群众、从中央到基层、从首都到全国、从大学到社会的文革“样板”！

---

<b>【书海泛舟】</b>		
<b>《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b>		
<b>目录</b>		
<b>孙怒涛 主编</b>		
<b>上册</b>		
<b>【序言】</b>		
“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	秦晖	1
<b>【导论】</b>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历史引论·····	唐少杰	37
<b>【前言】</b>		
前言·····	孙怒涛	80
<b>【岁月印迹】</b>		
回忆 1966 年夏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刘泉、刘才堂	91
“小三家村”事件·····	刘守昭	115

酝酿红卫兵首次大联合亲历二三事·····	刘泉	122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	阎淮	140
荒唐岁月说荒唐·····	林海	174
迷乱的粒子——“文化大革命”中的清华工程物理系·····	张比	180
我和清华“红教联”·····	林贤光	231
我与“陈里宁案件”和《“狂人”日记》·····	曾昭奋	348
第一座毛主席像修建始末·····	杨涵舒	381
清华武斗期间的两件亲历事·····	高晋占	395
动农馆旧事追忆·····	陈光海	403
5·30 难以忘怀的碎片记忆·····	高子正	410
5·30 武斗中的浴室守卫回忆·····	苏鹏声	416
我与 414·····	周泉纓	428
鬼门关下的徘徊——被遗忘的 516·····	王克斌	442
圣人不仁，刍狗奈之何？ ——《煤油灯下写成的报告》之来龙去脉·····	王醒民	450
与蒋公南翔“会师”劳改场·····	王醒民	470
鄱阳湖畔的岁月·····	容文盛	491
鄱阳风雨堪追忆？·····	曾昭奋	514
不堪回首的鲤鱼洲·····	王普	531
四十年后忆当年·····	张喜英	565
十年风浪 一笔烂账·····	李子壮	579
校园文物抢救纪实(外一篇)·····	郑宗和	605
我曾是清华政治辅导员·····	张蔼玲	617
1976 年天安门广场白花事件经过·····	周为民	629
<b>【人物春秋】</b>		
文革时进入中共核心的“主席机要员”谢静宜·····	丁抒	639
犟人杨超·····	高越农	662
朱勇访谈录·····	李仕林	677
谈“孙耘事件”：以宽容消解文革恩仇 ——罗征启访谈录之一·····	杨继绳	697
文革中蒯大富与聂元梓关系略考·····	张从	717

## 下册

## 【亡灵祭坛】

“迷糊”之貌 清澈之心——怀念谢晋澄同学

..... 但燊、樊程、陈化新、郑玉歆	731
回忆史明远同学并寻思他自尽的原因.....高越农	752
陈贯良之死.....侯国屏	760
7·27 前夕不幸遇难的同学与实验员.....陆忠楠	765
忆磊落及那些逝去的日子.....吕述祖	769
最后罹难者的启示——悼钱平华兼思索.....仇伟立	799
往事 真情.....孙耘	812
屈死的“516”冤魂——栗乃志.....王克斌	841
忆蔡达友.....姚志修	845
张怀怡同学自杀前后.....周启博	850

## 【校园内外】

1968 年夏在清华大学的文革经历..... 黄小励	859
我介入了北京的天地派之争..... 林贤光	879
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文革初期纪实	
..... 姚志修、林刚、戈更新、俞灿明、杨馨馥、郑一鸣	894
良知未泯——一个海军宣传队员在清华的文革记忆..... 朱勇	966

## 【思辨研讨】

穿越历史的急流险滩——回顾文革引起的反思.....陈中平	979
我们时代的座右铭——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心路历程.....胡鹏池	1029
必须坚持“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胡鹏池	1060
文革·清华·人性.....黄瑞和	1082
试论文革中“全面内战”的责任问题.....李仕林	1098
找回自身的庄严——反思文革读书札记.....陆小宝	1113
“文革”对话录.....邵济群	1181
我对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思考.....沈昆	1196
文革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民众基础.....王克斌	1228
对“李磊落现象”的思考.....王允方	1239
又到八二四.....王允方	1249
关于文革的思考.....吴学民	1256
我看清华文革..... 阎长贵	1270
二校门沉思录.....张比	1295
对一份后文革年代资料的多重解读.....张比、孙耘、唐少杰	1311

北大与清华文革异同之比较·····	张从	1356
一个当代清华学生的思索·····	甄仁佑	1381

### 【资料拾零】

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大会（照片）·····	陈仲华	1391
火烧科学馆（照片）·····	顾耀文	1394
《动态》目录（部分）·····	李海文、钱久业等	1396
1966年8月4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及资料整理的说明·····	刘泉	1403
彼有剑兮 君有枪——记1967年春的三篇大字报·····	马凯梅	1425
1968年8月4日两派协议（影印件）·····	王良生	1429
我的文革“文物”·····	王文中	1432
《内部参考》目录·····	赵世琦	1435

### 【附录】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统计表·····	唐少杰	1441
清华文革书目·····	孙怒涛	1451
《清华文革回忆反思文集》征稿启事·····	孙怒涛	1453
【光碟目录】·····		1456
【后记】		
后记·····	孙怒涛	1457

### 【书海泛舟】

## 清华文革书目

孙怒涛 辑

### 清华文革专著书目

1. 刘冰. 《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
2. 唐少杰.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沈如槐. 《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4. 周泉缨.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 香港: 银河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5. 孙维藩. 《清华文革亲历 孙维藩日记》.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第一版。
6. 邱心伟, 原蜀育. 《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香港: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2009 年 4 月第一版。
7. 唐金鹤. 《倒下的英才》. 香港: 科华图书出版公司, 2009 年 11 月初版, 2013 年 1 月修订版。
8. 许爱晶. 《清华蒯大富》. 香港: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1 年 3 月第一版。
9. 孙怒涛. 《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香港: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2 月第一版。
10. 蒯大富. 《清华文革“五十天”》. 香港: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第一版。
11. 叶志江. 《走出文革》. 美国: 溪流出版社, 2014 年 2 月第一版。
12. 启之. 《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 台湾: 独立作家出版社,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13. 孙怒涛. 《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香港: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5 年 2 月第一版。

#### 涉及清华文革的书目

1. 陶德坚. 《风雨人生》. 加拿大: 天下一家出版社, 1997 年 7 月初版。
2. 谭昌龄. 《书生乱弹》. 北京: 北京图书出版社, 2009 年 8 月第二版。
3. 金品玮. 《非常年代的清华女生》.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0 年 2 月第一版。
4. 傅培程. 《云卷云舒》. 美国: 柯捷出版社, 2011 年。
5. 陈继芳, 马小庄. 《潮起潮落》. 自印本, 2011 年第一版。
6. 王友琴. 《文革受难者》. 香港: 开放杂志出版社, 2011 年。
7. 杨继绳. 《杨继绳: 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述评集》.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13 年 10 月初版。
8. 聂树人. 《“三司”与<首都红卫兵>——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 香港: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第一版。
9. 聂树人. 《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 香港: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第一版。
10. 李自茂. 《毕竟东流去》. 香港: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版。

11. 米鹤都. 《回忆与反思》. 香港。